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妄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7月17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5日，日本发表“遮断航行”宣言，封锁我国全部海域。9月13日，卢沟桥事变两个月后，日本海军第四舰队侵占了连云港前方海域中的前三岛，由此揭开了海属地区8年抗战的序幕。海属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海属地区的抗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详见《海属抗战的地域特色》。

“一带一路”战略体现出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作，还包括政治、文化、军事、教育、科技等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其他交流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走在经济等合作的前面，而且比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更为持久、长效。刘成文撰写的《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共建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平台——关于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的研究》一文深入分析了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的基本特点，着力探寻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的难点，结合连云港区域文化发展的实际，纵论连云港在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中的作用。

在全市人民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一部全面反映连云港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众志成城，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的书藉《连云港抗战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一经面世，迅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市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市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蔡立志先生以《历史的真实 胜利的诗篇》为题，对该书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解读。

清代谢元淮主编的《云台新志》，体例清新，文采斐然，贴近群众，给后世修志者留下个很好的样板。同时他又是一位善于写诗的人，现在依然有不少游客，因谢元淮诗词的魅力而走访云台。他写的长诗《鲰言》，全诗分二十个段落，每个段落短的十几韵，长的几十韵，浩浩荡荡，洋洋洒洒，从盐税对国计民生的价值咏起，便切入现实，讲盐政的腐朽与衰败，讲改革的紧迫和艰辛。详见我市著名文史专家彭云老先生的文章《谢元淮和他的〈鲰言〉》，对谢元淮有一个中肯的评价。

磨山位于东海县城之北25公里处，苏鲁两省交界，北依烟波浩渺的海陵湖，东邻石梁河镇，南面是青湖镇，西靠东海经济开发区南辰北区，西南方向则属于山东省临沭县。磨山为苏鲁交界处的一座名山，山上有唐代古寺，有山门、巨灵殿、三官殿、雷神殿、三教堂，殿堂间石级、甬道相连，环寺地形险要。名山鼎名塔，磨山抗日烈士纪念塔是在抗日的烽火中，为纪念在抗战中壮烈牺牲的营长杨庆福、县大队长樊彦英等177名烈士，由县参议会副参议长杨凤鸣等人负责筹建，于1944年9月破土动工，1945年4月落成，是东海县境内唯一的一座抗日烈士纪念塔……详见王宗富撰写的《磨山史话》。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 (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婁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云
韩世泳

主任: 苏中保

副主任: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委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淙 王滨
白植明 朱荣
刘鹏 邱仕明
何洪斌 陈毅敏
胡卫星 姜龙才
郝芳 戚盼德
韩翠林

主编: 苏中保

副主编: 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 张骏鹏

目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专栏

- 04 海属抗战的地域特色 / 苏中保
09 赣榆抗日战场上的草根英雄 / 葛华
13 孙永钧:一位“四行”壮士的抗日人生 / 祝新华
16 刘传钵:巧挖敌堡 将计就计 / 唐其德 樊振
18 抗日老战士李长剑忆抗战 / 宋继奎
21 黄窝村抗日记忆 / 胡可才
24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五) / 本刊编辑部

读史评志

- 26 历史的真实 胜利的诗篇
——读《连云港抗战志》有感 / 蔡立志

历史与发展

- 29 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共建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平台
——关于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的研究 / 刘成文

郁洲溯源

- 32 山东庄里藏名洞——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一 / 伏广喜 同祥富 杨庆昌
35 八朝古城所在地——城子村 / 孙铭

地方文化研究

- 38 谢元淮和他的《麟言》 / 彭云



录

40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二) / 刘凤桂

往事追忆

43 连云港市解放初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张学贤

风物览胜

46 磨山史话 / 王宗富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血战连云

——连云港抗战石刻精选



好消息!

成功关注“连云港史志”微信获赠2016全年连云港史志
“了解港城历史的窗口”,欢迎您关注连云港史志官方微信!
(查找公众号“连云港史志”或手机扫描左侧二维码加关注)

成功添加关注,阅读点赞,截屏图片发 lyshitan@163.com,
注明通联地址,可免费获赠2016全年连云港史志内刊。

本刊编辑部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69号

邮编:222006

网址: www.lysz.gov.cn

电子邮箱: LYshitan@163.com

电话: (0518) 85825137 85821368

印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2015年第5期总第101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海 属 抗 战 的

地 域 特 色

苏中保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7月17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5日,日本发表“遮断航行”宣言,封锁我国全部海域。9月13日,卢沟桥事变两个月后,日本海军第四舰队侵占了连云港前方海域中的前三岛,由此揭开了海属地区8年抗战的序幕。海属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海属地区的抗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海属抗战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不屈的精神风貌,无论是国民党军正面抗敌,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都涌现了无数英烈,取得丰硕成果。

正面战场。自1937年8月起至1939年3月,国民党第7军、第31军、第40军、游击第8军、第57军、第89军先后守卫连云港地区。其中第7军、第31军、第40军守卫期间,日军未敢轻举妄动,双方只是偶尔发生摩擦,没有发生大的战事。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第13师团北渡长江,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侵略华北的日军第10师团从

山东青城、济阳南渡黄河,占领济南后,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一线。日本大本营为打通津浦铁路,使南北战场连成一片,先后调集8个师团另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意图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西取郑州,再沿京汉铁路南夺武汉。中国当局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多万人,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分出一部兵力部署在津浦线南段阻击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陇海铁路东端起点、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的门户,海州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日军占领连云港,一可以把连云港作为日军海上增兵的登陆点,二可以从徐州东翼对中方部队实行打击,直接支援日军占领徐州。1938年4月初,台儿庄大战结束后,日军调兵遣将包围徐州,企图在徐州消灭中国军队主力。4月中旬,为策应徐州会战,前三岛的日军海军第四舰队出动军舰两艘,炮击东西连岛。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当晚,日军第四舰队陆战



队在舰炮掩护之下,发动了连云港登陆战。自1938年5月19日晚起,至1939年3月连云港市全境沦陷,守卫连云港市的游击第8军、第57军、第89军与日军进行了大小30余次的战斗,特别是第57军第112师667团团长万毅指挥部队,顽强地与日军进行了丫髻山阻击战、孙家山肉搏战、墟沟海头湾反市战、大桅尖争夺战等,打退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企图登陆的日军被中国军队击退回到海中舰艇上。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正面战场的抗敌斗争,连云港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有力地守卫了港口及煤炭、磷矿石、粮棉等战略资源,创造了中国守军守卫一座城市达289天的记录,迟滞了日军侵华的步伐,延缓了海属沦陷的时间。

敌后抗战。1939年3月4日,海属地区全境沦陷。面对侵华日军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资源掠夺,海属地区抗日军民在罗荣桓、徐向前、朱瑞、黎玉等领导下,拿起武器,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武装,保家卫国,与日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2旅、教导2旅,新四军3师8旅、10旅及地方武装积极开辟敌后战场,与侵华日军进行了大小500余次的战斗,粉碎了日伪疯狂的“扫荡”“蚕食”和“治安肃正”计划。八路军山纵队海南游击支队第3团组织的五里槐伏击战,打响了沦陷后海属军民奋起抗击日寇的第一枪;由八路军教导2旅和山东纵队2旅配合开展的青口战役,是八路军东进滨海抗日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扩大和巩固了滨海抗日根据地,十八勇士的英勇事迹,鼓舞着抗日军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以八路军教导2旅、第57军独立旅、友军第111师以及海陵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开展的海陵反“蚕食”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士气,提高了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丰富了斗争经验;由符竹庭政委、陈士榘司令员指挥的赣榆战役,以我军仅牺牲3人的代价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其战术之妙、代价之小、战果之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消灭了日伪大量

的有生力量,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海属抗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广大民众建立敌后武装之中,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之中。

海属地区早期党员率先起来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全面抗战开始后,海属地区的早期党员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率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夏,东海县的周晓江、邹华民、李铁民等组织“时事座谈会”,仿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织,在邹圩秘密成立了“中国青年抗日救亡义勇团”。1938年初,孙存楼、武永嘉等在灌云发起成立了“腊九社”,推动了东(海)灌(云)沐(阳)一带的抗日运动。陶君彦在赣榆组织“青救团”“醒民剧团”,发动一批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早期共产党员的努力,推动了海属地区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以后党组织的重建和海属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9年3月,海属地区全部沦陷。日寇侵略的不断扩大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海属地区的抗日斗争迫切需要取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为此,在自觉组织抗日活动的同时,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开始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1939年1月,中共苏皖特委成立中共海属工作委员会,在东灌沐重新建党。2月,中共海属工委改组为中共海属中心县委,下辖灌云县委、东海县委、宿沭县委。1938年6月下旬,中共鲁东南特委(部队系统)书记赵志刚派李旦夫到赣榆建立了中共赣榆县特别支部。同年冬,赣榆特支改属山东省地方党委领导。海属地区的找党活动和党组织的重新建立,充分反映了海属地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是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活动。海属人民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成为海属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强大动力。

中共党组织在连云港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1938年初,57军112师进驻连云港。中共中央非常关注112师,决定争取该部成为我党团结抗日的友军。中共长江局派巡视员张文海和谷牧到112师667团开展党的工作。1938年3月,伍志钢、李欣根据长江局的指示,带领80多名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加入667团。在张文海主持下,成立了中共第112师工委。工委成立后首先吸收667团团长万毅入党。许多中下层军官如营长刘杰、排长江潮等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667团各个营、668团第一营都建立了党支部。在中共112师工委的努力下,112师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昂,尤其是万毅的667团。中共在第112师开展的工作,为连云港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长达三个多月的连云港保卫战中,万毅的667团等部多次给予登陆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切断了日军沿陇海铁路线向西侵略和补给的通道。

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党中央关于开辟鲁南、苏北的战略任务,八路军主力部队积极向海属地区挺进,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八路军第5纵队在黄克诚的领导下东渡运河,进入淮海区,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迅速改变了淮海区的斗争形势。1940年11月中旬,八路军山东纵队2旅进入滨海地区南部,开辟赣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3月,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发动了青口战役,扩大和巩固了包括赣榆在内的滨海抗日根据地。青口战役之后,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乘胜向陇海路北的东海县进军,开辟了海陵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东进南下,打开了鲁南、苏北的局面。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灌云、东海、赣榆、海陵等四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对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担负了主要的对日作战任务。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后的海属地区建立起第一支正式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游支队第3团。在海属地区长

期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主要有八路军山东纵队2旅、115师教导2旅、新四军第3师8旅、10旅等部。这些部队为海属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发起、组织了海属地区主要的战斗如青口战役、海陵反“蚕食”战役、赣榆战役、解放陈家港战斗等,抗击了绝大部分的日伪军,为海属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等众多党的优秀儿女牺牲在了海属大地上。

中共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进行自卫斗争。抗战初始,中共提出全民抗战的策略,反对只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抗日团体,调动各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广大的民兵和自卫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拿起武器保卫家园。1941年12月,朱圩民兵击败了携有重炮、机枪的伪“兴亚军”一个连和日军一部。1942年5月,大拐圩的民兵、自卫队员同装备精良、十倍于己的1000多日伪军激战了3天3夜。最后一天,滨海大队的两个连和一个基干分队以及新四军第10旅第29团陆续赶来增援。这一战,共毙伤日伪180多人,俘2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此外,云台大队、滨海大队等多支地方武装在长期的对敌作战中得到了锻炼,以后还上升为了主力部队。抗战期间,在海属地区存着两条重要的交通线,一个是横跨陇海铁路线的苏鲁交通线,一个是从柘汪到苏北东台梁港的黄海抗日运输线。前者保障了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以及华中根据地与党中央的联系。刘少奇、罗荣桓及新四军的许多部队领导和人员都是通过苏鲁交通线安全过往陇海线的;后者则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抗战物资。这两条交通线的安全存在为海属地区的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和海属人民对抗战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是分不开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保证了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的生存发展。

海属抗战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中国共产党人以博大的胸怀、摒弃前嫌,尽



最大努力将多方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洪流。

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共就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中共领导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也伴随着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在海属党组织重建之前,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向赣榆、东海县陆续派出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成员,成立县动委会,推动海属抗日救亡工作。海属地区的共产党员从报纸、广播中得知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团结抗战”的方针,他们也有意识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时期,赣榆县是抗日统战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1938年初,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国民党赣榆县长朱爱周重建赣榆县动委会,吸收了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委员。中共赣榆特别支部建立后,积极进行城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朱爱周领导的赣榆县政府和军队倾向进步,走上抗日的道路。随着中共党组织在海属地区的重建,尤其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界爱国人士有了自己抗战的“家”,海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始由中国共产党公开直接领导。

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中,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各县抗日民主政府都成立了县参议会,参议长均由民主人士担任。灌云县参议长吴月波以后还担任了淮海区参议长。民主人士广泛参与抗日政权,促进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成为党和政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敌的纽带。他们积极参与抗战,既是中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体现,又为建立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民主政权还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顽固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灌云县顽县长谢廷升、东海县顽县长康寿峰及其后任县长董建华、赣榆县顽县长兼保安旅长董毓门等人及政权,先后受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打击。打击顽伪势力,争取了更多的中间人士加入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海属抗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大抗日中坚力量相互配合、团结作战的范例。苏鲁交通线、黄海抗日运输线打通了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的纽带。

1939年,中央要求“八路军一部要迅速南下,向华中进军,坚决控制今苏北,新四军也应即向江北发展,共同完成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海属地区正处于华北与华中的接合部,控制海属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打通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敌后抗战成败的关键。

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东进鲁南,开辟滨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黄克诚率第5纵队南下支援新四军,开辟淮海区抗日根据地。活动于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武装,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八路军山东纵队2旅,另外,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均长期在滨海抗日根据地驻扎,成为指挥山东抗战的中枢,刘少奇、罗荣桓、徐向前、朱瑞、谷牧、陈士榘、肖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在淮海区抗日根据地,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3师,黄克诚任师长。新四军3师郑潭口战役、高杨战斗、陈家港战斗等,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1943年11月,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新四军3师8旅23团调滨海区,随即和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4团、6团,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取得了赣榆战役的胜利。在大吴山战斗中,23团有个“小鬼班”,全部英勇牺牲,此后,23团长期在滨海战斗,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期间,在海属地区存在着两条重要的交通线,一个是横跨陇海铁路线的苏鲁交通线,一个是从柘汪到苏北东台弥淮的黄海抗日运输线。苏鲁交通线保障了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以及华中根据地与党中央的联系。刘少奇、罗荣桓及新四军的许多领导和人员都是通过苏鲁交通线安全讨往陇海线。苏鲁交通线的存在,保障了八路军和新



四军之间的联系,使华中与华北两大根据地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多次粉碎日伪对苏北和山东两个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促进了两大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黄海抗日运输线则是在日军严密封锁的海面,八路军滨海部队海防队,新四军驻东台的部队,爱国船民密切配合,开辟了沟通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海上运输线,正是这条海上运输线,护送革命同志,输送战略物资,发展根据地经济。这两条交通线的安全存在为海属地区的抗战及至整个中华华北的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属抗战史上敌工战线的斗争,是浓墨重彩的篇章。海属地区的抗战军事斗争,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对广大民众作了一次最彻底的熏黑洗礼。

敌工人员深入虎穴,战斗在日伪的心脏,发挥了巨大的教育引导作用和输送情报功能,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东海县委派马楠打入新浦伪保安总队部当文书,在新浦、海州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在1942年日军大“扫荡”的最艰苦时期,起了不可替代作用。滨海军区敌工部派遣多支敌工队伍到连云港、新浦、海州等城区,打入日营企业、飞机场、电台等要害部门发展关系,搜集了日军兵种、番号、人员装备、港口情况、海岸地理、海水深度、最大吞吐量、装卸能力、导航线路、标志以及码头上的各种设施情况,及时绘制地形图,编制连云港地区敌情资料,不仅为滨海军区领导机关提供了情报,而且也为盟军准备在沿海作战提供了战略资料。

敌工工作在解放赣榆城等具体战斗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敌工人员积极在伪军中发展内线,争取瓦解伪军。特别是解放赣榆城,敌工人员利用内线关系伪副官刘连城打开城门,八路军没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地攻入高墙深垒、戒备森严的县城,减少了伤亡和消耗。另外,通过内线工作,伪141团团长黄胜春,信守诺言,保持中立,率全团没放一枪,并在关键时刻敦促伪旅长李亚藩弃械投降,八路军仅用不到20小时的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地全歼伪和平建国军第36师71旅和伪保安队、盐

警队共2000余人,解放了被日伪军盘踞达五年之久的赣榆县城。中共灌云县委为拔除驻沟掘点,派共产党员夏秋打入伪军杨九洲部,在据点里建立起地下军,最后内线、地下军与东海警卫团等里应外合,端掉了号称海属第一的伪据点。

敌工工作在瓦解日伪军心方面更具实际成果。1944年中秋节,海陵敌工部长李光明带领五六十名敌工宣传队员,深入白塔埠以东敌占区,开展政治宣传,揭露日伪突击队抢掠抓丁的阴谋,特别是加强对伪军的宣传。时值中秋,他们便唱起“八月中秋月儿圆,西瓜月饼少半边”的歌曲,动摇伪军军心。1945年初,海陵县委敌工部在东部地区把几十名伪保长“请”出来集中训练,带他们到根据地参观,给他们谈形势讲道理指明出路。通过教育后,许多伪保长纷纷投靠民主政权,使那一带日伪政权名存实亡。1941年,灌云县朱墟区徐北乡侍圩情报站情报员侍浩山进入大伊山散发传单,居然散到日军司令官的床上,甚至把传单贴到岗哨的脊背上,使日伪军十分恐慌。

敌工工作人员深入虎穴,隐蔽作战,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敌人心脏,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加强对日伪军和伪政权组织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军事斗争。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不怕误解,经受委屈,大智大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抗战时期,由于海属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广大海属抗日军民的英勇奋战,海属地区抗战的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海属地区本身,这里的抗战斗争在苏鲁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者系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办主任)

责任编辑 于冰清



赣榆抗日战场上的 草根英雄

葛 华

抗日战争时期,在赣榆大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战士,没有编制,不在战斗序列;他们不是党员,没有组织,没有人领导。但是他们凭着中国人固有的正义感和良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保家卫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地投身抗日战场,尽自己绵薄之力,积小胜为大胜。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们是英雄,是赣榆抗日战场上的草根英雄。

汪素珍勇救八路军小战士

1941年3月,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和山东纵队2旅联合发起青口战役,取得八路军东进滨海抗日的第一次大捷。青口战役中,有十八位“老六团”的战士为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而被增援的日伪军围困在青口火叉巷,与敌激战竟日,最后10人壮烈牺牲,8人被俘,被押至新浦宋兵队,受尽酷刑,最后5人壮烈牺牲,3人死里逃生,这就是青口战役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的“十八勇士”的战斗事迹。

“十八勇士”的英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载入史册,但青口战役中还有一位勇士被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下来,后来平安地返回了部队,重新走上抗日杀敌战场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火叉巷在青口前宫东路,紧靠东门里、南圩根,是一条极不起眼的狭窄的小巷,小巷由北向南往东西方向各再伸出一条短窄的小巷,形似拨火用的火

叉,故名火叉巷。别看火叉巷窄小,住户却不少,大多是贫困人家,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挤着一户。1941年3月26日清晨,被响了一夜的枪声吓得没合眼的时年38岁的大嫂汪素珍,打开大门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突然看见门前台阶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单薄的身子,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灰军衣,清瘦苍白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汪大嫂着实吓的不轻,以为门前躺着的是具死尸,用脚踢了踢,那人还能动,并且还轻轻地哼了声。是活人,汪大嫂就不怕了,她赶紧俯下身子看了看,这人年纪不大,顶多十七八岁,还是孩子。汪大嫂心想,这人不是小鬼子,也不是汉奸队,小鬼子穿黄军衣,翻毛牛皮鞋,汉奸队二鬼子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两年都见过。不是小鬼子,也不是汉奸队的,和他们打仗的,肯定就是八路军了。八路军没见过,但听说过,汪大嫂的丈夫是街里恒顺粮油店的伙计,经常跟着老板到西北乡进货,早就听说那一带是八路军的地盘,是根据地。八路军是打鬼子的,对穷苦人可好啦,不打人,不杀人,还分粮食给穷人度春荒。汪大嫂想,八路军是好人,凡是打鬼子的都是好人,不管是死是活,先把这人弄到家里再说。

汪大嫂正值壮年,身强力壮,稍一用力,就把那个又瘦又小的小战士拽进了院子,赶紧关上大门。这时,那个小战士醒了过来,挣扎着要站起来,汪大嫂望着小战士干裂的嘴唇,赶紧端来一碗水,那小



战士也是渴急了,一口气喝了下去,缓了一会,似乎有了力气,站起来说:“大嫂,我不能连累你。”说完就要拉门出去。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日本鬼子叽哩咕噜的喊骂声。汪大嫂不容分说,一把将那小战士推进屋里,小声说:“别出声,别出声,你这身打扮,这口音,出了门,还能有命啊!”

天大亮了,巷子里不时传出阵阵枪声,汪大嫂拿出丈夫的衣服,给那位小战士换上,用清水给那小战士洗了洗脸,把沾满血迹的破军衣塞在床底下,还好,那小战士没有负伤,只是饥渴疲劳过度,吃了个煎饼又喝了碗水,又精神起来,几次要冲出去,与鬼子拼命,汪大嫂死活不让他出去。汪大嫂对小战士说:“这会儿你从我家出去,你活不了不说,就怕我们家也活不成了。”然后不由分说,将那小战士扶到床上,盖好被子,吩咐道:“如果鬼子搜到家里,我就说你是我儿子,正害伤寒,不能下床,你口音不对,千万别出声。”

就这样,汪大嫂将那位小战士在家里整整藏了三天,小鬼子和汉奸队几次到家里搜查,看到床上躺着一个面黄肌瘦病秧秧的孩子,也就不大在意,让汪大嫂几句话就应付过去。第四天风声小了,天刚蒙蒙亮,汪大嫂的丈夫带着那个小战士以下乡收购粮食的名义出了青口城,一路向西,顺利地把他送到老六团的驻地城头东大坊村。

仲兆德义葬八路军烈士

仲兆德,青口镇河南村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憨厚耿直,大字不识一个,为了种好二亩地,整天背个粪筐四处拾粪,从不多言多语,惹是生非,如果不是我们的武工队员找上门询问,谁也不信他能有这样的惊人义举。

1941年3月26日,八路军攻占青口后,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歼灭了800多个日伪军。我军在达到战役目的后,打扫完战场,安葬好烈士的遗体,抬着伤员,押解俘虏,安全转移。可掩护大部队撤退转移的孟兆阁、原飞友等18位勇士却被从新浦赶来增援的日伪军围困在青口火叉巷,他们与日伪军血战一日,大部分战死,遗体被抛在青口河南

乱葬岗。

青口战役后的一天早上,仲兆德像往常一样背着粪筐四处拾粪,发现乱葬岗附近有几只野狗在转悠,仲兆德走近一看,发现有几具八路军烈士的遗体被扔在这里。烈士们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仲兆德本想一走了之,可又不忍烈士们暴尸荒野,喂了野狗。他心想人死后,应该入土为安,既然看见了,就得替他们安葬,不然良心过不去,会遭报应的。

仲兆德就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一贫如洗,为烈士置办不起棺木,再说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闹出多大的动静,只好除了几领席,买了几刀纸,按青口当地穷人家的风俗,为每个烈士做了个席篓子,勉强送下地安葬。这一切都是仲兆德瞒着外人,悄悄一个人干的,就连他家左邻右舍的邻居都不知道仲兆德干了这件惊人的义举。那时青口是日本鬼子的天下,掩埋八路军烈士的事,谁敢声张。

青口战役后不久,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在赣榆县西部马鞍山上,为抗日烈士修建陵园和纪念碑,教2旅的首长派出武工队员到青口周围寻找和迁葬烈士的遗体,武工队员几经周折才打听到仲兆德自觉帮助安葬八路军烈士的义举,部队首长派专人向仲兆德表示感谢,仲兆德只说了一句十分朴实的话:“死者为大,入土为安,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然心中不忍。”

吕贤才舍家救护八路军女干部

1942年春,日伪军向我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春季大“扫荡”,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蚕食”根据地。

3月下旬的一个漆黑的夜晚,赣榆抗日民主政府第三区区长兼区中队长柏斗繁带着几个人悄悄敲开吕圩村伪保长吕贤才家的大门,一干人等闪进院内,柏斗繁领着两名八路军女干部在堂屋落座后,低声对吕贤才说:“老吕,这位是我们首长的家属,有了身孕,快要生孩子了,现在鬼子对我们根据地大‘扫荡’,她们随部队行动不方便,上级决定由你负责掩护她们,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危险,你要



记住,就是自己死了,也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吕贤才看着区长严峻的面孔,深感责任重大,忙说:“柏书记,你放心,我吕贤才虽然干着鬼子的保长,但俺是白皮红心,暗地里是为八路干事的,我家也不是第一次掩护八路军和伤病员,我就是全部家产不要,也要用身家性命保护这两位同志的安全!”柏斗繁接着说:“老吕,共产党相信你,才把她们送到你家,你不要害怕,我们也会在暗中保护你们的,等鬼子‘扫荡’一结束,我们就来接人。”

这吕贤才在殷庄一带很有名气,祖上靠省吃俭用,置下不少的田产,吕贤才读过私塾,上过新学,接触过新思想新知识,加上为人和善,乐于接济乡亲,在老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吕贤才的家乡,吕贤才本想卖掉田产,拉起一支队伍抗日打鬼子,中共地下党员柏斗繁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动员吕贤才以灰色面孔,坚持在敌占区为共产党、八路军工作,表面上干的是日伪军的保长,实际上白皮红心,干的是共产党的工作。吕贤才家成为共产党在敌占区安设的“堡垒户”,共产党许多干部战士和伤病员都曾在吕贤才家隐蔽过,得到过保护。1940年底,柏斗繁以探马庄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教唱抗战歌曲,组织青年学生秘密参加八路军,后来真实身份不幸暴露。国民党顽固派赣榆县长董毓门准备派兵逮捕柏斗繁,幸得爱国民主人士、八区区长张伯扬事先得到消息,及时通知了柏斗繁,柏斗繁迅速潜入吕贤才的家中躲避,风头过后,才乘夜深人静逃至山东莒南甘霖村,找到八路军115师临郯赣东四县边区游击支队(共产党领导的赣榆抗日武装),才免遭董毓门的毒手。

这次柏斗繁安排在吕贤才家保护的二位女同志是姊妹俩,姐姐徐森,中共徐山区委宣传委员,丈夫是赣榆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邱也民,此时已有8个月的身孕,行动很不方便,不能跟着大部队转移反“扫荡”,因此,由妹妹徐静陪同,经组织安排在吕贤才家暂时安顿下来。

吕贤才将徐森姊妹俩安置好后,告诫自己的家人对外要绝对保密,不准走漏半点风声。因徐森当

时正怀有身孕,吕家对她的照顾更是体贴周到,就像自家的亲人一样。

虽然吕家对外采取了极其严密的防范措施,但像恶狗一般到处为非作歹的日伪军还是探听到了一些风声,准备派人前来搜捕。潜伏在日伪军内部的敌工人员立即通知了吕家。吕贤才赶紧把徐森姊妹俩藏在夹皮墙中,然后出来与敌人周旋,日伪军把吕家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抓到要找的人,于是就用刺刀逼着吕贤才交人。面对凶恶的敌人,吕贤才沉着镇静,毫不畏惧,拒不承认自己家中藏有八路军的干部,敌人见问不出结果,就到村里抓了不少老百姓进行拷问,并扬言谁要指出吕家藏了八路军,赏大洋100元。老百姓本来就对日伪军恨之入骨,再加上吕贤才平时对乡亲们很友善,经常扶贫助危,八路军又是老百姓的救星,因此一致作保,证明吕家没有藏八路军。日伪军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把吕贤才暴打一顿,敲诈了一笔钱,又把他家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扬长而去。

吕家的财产虽然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保护了徐森姊妹俩安然无恙。为了安全起见,吕贤才连夜将徐森姊妹俩转移到他弟弟家中,藏了几个月,在吕贤才弟弟家中,徐森顺利地生下一个胖小子。直到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徐氏姊妹俩才带着孩子平安地回到了根据地。

王家驹智运印刷机

王家驹,赣榆县青口镇人,自幼家贫,十几岁就跟着父兄挑“八根系”,贩海货到西北乡赶集做小买卖。1941年3月,八路军打下青口后,血气方刚的王家驹找到部队领导要求报名参军。当时赣榆西北乡刚刚解放,根据地还在初创阶段,八路军也是初来乍到,急需在青口安插内线,传送情报。“老六团”首长发现王家驹聪明伶俐,机警干练,言谈不俗,处处透着睿智,知道是有担当的可用之人,就动员王家驹暂时不要跟着部队走,仍然留在青口。暗地里为八路军做宣传发动工作,动员更多的青年参加八路军。王家驹欣然接受任务,愉快地留了下来。

那时,日伪军占据青口,到处白色恐怖,汉奸队



疯狗一般到处乱窜,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动员青年参军的工作既困难又危险,稍有不慎,走漏了风声,就有被捕杀头的可能。白天不便开展工作,王家驹就利用晚上走邻串户找同龄人玩耍的机会做工作,青年本人同意了,还得做他们父母的思想工作。当时八路军刚刚打到这一带,势力不大,影响也不大。老百姓虽然心里明白八路军是打鬼子的,是帮助老百姓求解放的,可当八路军打鬼子,枪弹无情,是要死人的。再说要是叫小鬼子、汉奸队知道家里有人当了八路,那也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在敌占区动员青年参军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困难。

尽管动员青年参军这项工作很难做,但王家驹凭着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的坚定信念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在几年时间里还是悄悄地动员了三十多个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每次成功地动员了几个青年后,王家驹就和参军的青年挑着筛筐子,里面放些虾皮子、咸烤鱼子,装成赶集做生意的样子,把他们安全地送到部队驻地。

1944年5月,八路军滨海军区敌工部的领导又交给王家驹一个十分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共产党、八路军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的宣传指导作用越来越重要,急需扩大印数,提高印刷质量,原来使用的石印机已远远不能达到工作要求,因此急待购置新机器。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从长远打算,决定购买先进的四开铅字印刷机。可是这种印刷机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制造,大城市里一些印刷厂、报馆所用的印刷机都是进口的,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到敌占区的大城市购买印刷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时恰巧王家驹又送来几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听说大众日报社要购买印刷机的事情后,就向政治部的领导反映,自己家乡青口镇有个小印刷厂,老板叫郭九峰,曾从青岛购来一台德国产的四开铅字印刷机。这几年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生意不好做了,印刷厂早就歇业,印刷机搁在家里闲置没用,早就想转卖。部队领导一听马上就安排武工队派人随同王家驹到青口郭家商谈购买印刷机的事。

郭家在青口经营印刷行业由来已久,早在1922年,郭家上一辈老人就购置了石印机和手摇印刷机,开设了印刷店,为小学生印制课本和练习簿,为商店字号印刷广告,还为县政府印讨“田赋流通券”。1942年3月,郭九峰从青岛购回一台德国生产制造的四开铅字印刷机,本想扩大经营,盘活生意,谁知小鬼子和汉奸队只知道敲诈老百姓,根本就不管工商业界的死活,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不说,隔三岔五的还有汉奸队来敲“竹杠”,哪次不给个百儿八十的,不是臭骂一通,就是“赏几个耳光”。后来郭家干脆关门大吉,歇业不干了。这次王家驹带人来买印刷机,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价钱也好说,没费多大的周折,印刷机就买妥了。

印刷机是买妥了,可怎么运出青口,运到抗日根据地。这可真让王家驹和武工队的人犯了愁。整台印刷机连同铅字,没有上千斤,也有七八百斤。重且不说,那时日本鬼子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别说整台机器,就连根洋钉子要想带出青口也是万难。

1944年5月,这天刚过午时,太阳晒得大地发烫,整个青口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到处冒着热气。远远的一队出殡的队伍,缓缓地向小东门走来。前头两把大号、两对铜锣鼓开道,后面一队小喇叭和丝弦,再往后是一溜送葬的孝眷围着一口薄棺哭哭啼啼。把守小东门的二鬼子,除了两个站岗的,其他人热得摇着蒲扇躲在岗楼里凉快,连个下来看景的都没有。送葬的队伍出了小东门,一路奔向鸡心滩,这天正好是大信潮,鸡心滩上早就停着一艘大舢板,抬棺材的大脚行把棺材往船上一放,连同吹喇叭的各自收拾家伙散去,扮作孝眷的王家驹和武工队员,驾着舢板,顺潮顺水,没用一袋烟的工夫就从下口出了海,傍晚时分就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出海口柘汪。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山东分局和大众日报社的领导打开棺材一看,躺在棺材里的就是盼望已久的德国产的四开铅字印刷机。

(作者单位:赣榆区史志办)

责任编辑 于冰洁



孙永钧：一位“四行” 壮士的抗日人生

祝新华

1937 年“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用顽强杀敌的行动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消灭中国”的狂妄叫嚣，谱写了一曲悲壮而感人的爱国之歌。而在这许许多多英勇抗日的革命军人中，有一位来自我市赣榆的炮兵连长，一直坚持战斗到上海全部沦陷，是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一，他叫孙永钧。70 年弹指一挥，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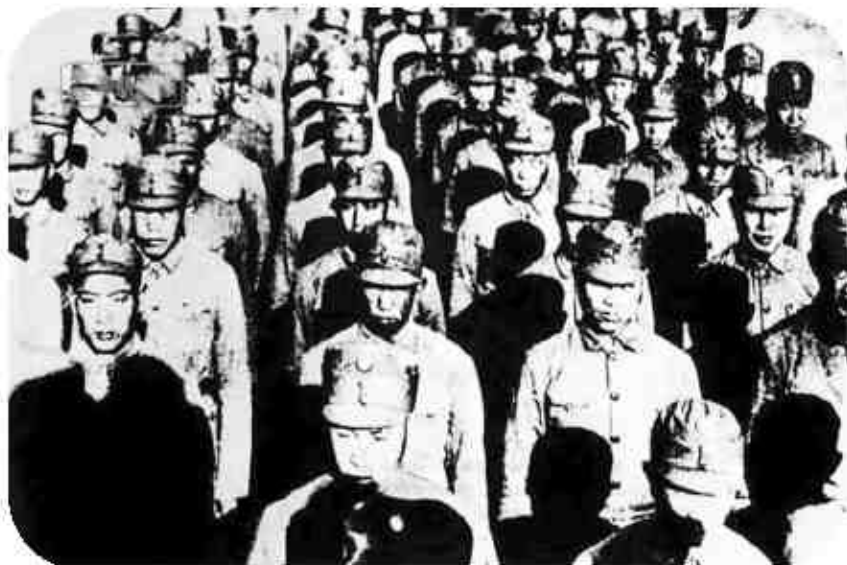
年壮怀激烈。值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特以此文纪念这位抗日英雄。

国难当头别妻离子参军报国

孙永钧，1904 年 11 月出生于苏北赣榆县城头镇城头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父母虽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他们持家有方，除拥有二亩土地，还经营一小豆腐店，靠精心打理，家境比较殷实，再加上父母

比较开明，所以天资聪颖而又爱学好动的孙永钧，很小就被送进了私塾读书，晚上还请人教习拳脚功夫。私塾先生为他按排行起名永钧，字伯衡。读书期间，孙永钧勤奋好学、积极上进，而且性格开朗、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深得先生喜爱。3 年后，因家里供不起，孙永钧辍学回家帮父母料理牛禽。几年之后，孙永钧娶妻成家，独立支撑门面。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城头镇驻地来了许多穿军装的人，在街上竖起招牌：当兵吃粮，报效国家。此时已是孩子



八百壮士



父亲的孙永钧，竟不顾父母与妻子的苦苦相劝，把家里的黄牛一扔，便报名参了军。因孙永钧长得高大魁梧，再加上有文化、会武术，参军入伍后被编入第88师262旅下面的一个连。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2月，孙永钧随部队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奉命担任江湾北端至庙行、蕴藻浜一线的防御。2月20日，日军对庙行88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孙永钧与其他战友一起迎击日军，在大、小麦家宅一带与敌展开激烈肉搏战，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此后，随部继续战斗在江湾、闸北一带。孙永钧作战勇敢、应变能力强，具有一定的指挥水平，逐渐得到上司赏识，并一步步被提拔为班长、排长、副连长，到1937年8月，他已是炮兵连长，驻防上海。

参加淞沪会战成为“八百壮士”

1937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日军攻陷大场、江湾、闸北、庙行地区。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战局危急。为避免全军覆没，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第88师奉命留下1个团，死守闸北，牵制日军。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主动请缨，他以所属1营为骨干，组成加强营：分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共450余人，其中孙永钧为迫击炮连连长，担任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掩护50万国军撤退的重任。因部队对外仍用团番号，称有800人，故有“八百壮士”之美誉。

这最后一块阵地，就是四行仓库，这里曾是第88师司令部驻地，储备了不少弹药和粮食。27日凌晨3点，孙永钧等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那时的四行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西面、北面已经被日军占领。这幢钢筋水



四行仓库

泥建筑的7层大楼，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楼高墙厚，易守难攻。面对四行仓库已成“孤岛”、四行壮士已是“孤军”，孙永钧带领全连英勇作战，配合其他4个连的官兵，从27日中午，一直打到30日午夜，与日军血战4昼夜，歼敌200余名，而国军仅伤亡30余人。其中，孙永钧腰部中弹，身负重伤，被战友们抬下火线，送往医院救治。

保卫战中，最让孙永钧感动的是，在战斗最激烈的28日午夜，女童子军杨慧敏把一面国旗裹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冲上火线，献给四行壮士。连最高指挥官谢晋元都热泪盈眶，激动地高喊：“给我们送来的不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第二天凌晨，当这面国旗在四行仓库的大楼顶上高高升起，隔河观战的群众欢声雷动，高唱《八百壮士之歌》。

31日，中国军事当局再三电令孤军撤退，谢晋元才带领剩余的四行壮士挥泪退入租界。这些都是躺在医院的孙永钧，后来听别人告诉他的。在医院治疗了2个多月，孙永钧才能下床稍作活动，医护人员告诉他，日军包围了租界，上海已全部沦陷，四行壮士被安置在“孤军营”，失去自由。面对所处困境，孙永钧只能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撤离上海，返回老家养伤。



返乡抗日壮士未酬成烈士

1937年底,历经波折回到故乡的孙永钧,在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半年后,孙永钧便主动找到主张抗日的爱国县长朱爱周,要求参加国民党地方武装——赣榆县保安大队,朱爱周听说他是参加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抗日壮士,十分钦佩,并委任他为保安大队下属的一名中队长。1939年2月开始,日军侵占赣榆东南沿海城乡,经常四处“扫荡”,烧杀抢掠,残害同胞,这再次激起了孙永钧的抗敌决心,他经常带着保安队袭击日军。1939年3月,赣榆县城沦陷后,为增加抗日力量把日军赶出县境,国民党赣榆县长朱爱周在第5区陡岭村将原赣榆县保安大队扩编为常备总队,同年11月,又在莒县朱家洼村,将常备总队扩编为常备旅,朱爱周兼任旅长,下辖3个团,其中孙永钧任1团2营副营长,追随朱爱周抗日。1940年3月22日晨,刚移驻县境第6区韦家岭村一个多月的旅部,突遭日军偷袭,朱爱周壮烈殉国。

1940年5月1日,顽固分子董毓琳继任赣榆县长兼保安旅长,他对日妥协,专事反共,残害抗日志士,并以“立场不稳”为由将孙永钧开除。孙永钧见依靠顽固县长董毓琳抗日无望,找来村里一伙青年人,向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上海抗战的悲壮事迹,青年都深受感动。他将组织游击队打敌人、保卫家乡的想法,同王兴彩、王宗茂、王恩吉、王恩庆、陈德奎、王敬昌等青年一起商量,得到大家赞同,他便悄悄地去山东临沭找八路军联系,请求支援。

1940年6月下旬的一天,孙永钧到山东省临沭县朱樊村(现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找到了在八路军东进支队第四大队工作的同学孟西元,讲明来意,得到支持。孟西元把他介绍给政委,政委见孙永钧是知识分子,又在部队任过连长,有战斗经验,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威望,经讨研究,委任他为营长,下属3个连。一连是刚起义的刘德明连,二连是正在家乡扩军的周维兴连,三连由孙永钧自行组建。他在部队住了6天,受到很大的教育。决心回家拉起武装,跟随八路军抗日救国,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于7月5日下午回

到家,脸没洗、饭没吃,就派人把抗日积极分子王象山、魏绪伶找来。孙永钧就在自家的碾台前,介绍了到临沭活动的情况和他自己考虑的初步方案。他说:“抗战守土,人人有责,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拉队伍抗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跟随八路军打日本一定能做出成绩。”他还激烈抨击了顽固县长董毓琳大搞反共摩擦的罪恶行径。孙永钧讲话时情绪非常激动,声音很高,没有注意保密。碾台南边就是大路,路西是一家地主的庭院,这家地主和孙永钧有矛盾,说的话被这个地主隔墙听得清清楚楚,便向顽固县长董毓琳告了密。

晚饭后,孙永钧召集了10多个有志抗日青年,在他住的那间小屋里开会,他对到会的人说:“已经和八路军联系好了,在城头拉起一个营的武装没问题,八路军大力支持我们,会后大家分头去串联。”

第二天一早,孙永钧还没有起床,就被顽固县长董毓琳派来的人抓走,押送到当时的夹山乡响石村顽固政府驻地。董毓亲自审问:“你去山东干什么的?”孙答:“找八路军的。”董问:“我部刘德明的一连呢?”孙答:“已经参加八路军去打鬼子了!”董大怒道:“听说你要拉队伍,干八路,可知罪?”孙义正辞严:“国难当头,扩军抗日,我有何罪?”孙永钧在董顽严刑拷打下至死不屈。

孙永钧被捕当天,城头一带的群众和部分上层人物纷纷呈递保状要求释放他,董顽却将保状一一驳回,不准保释。为防夜长梦多,当天晚上,董毓琳就下令将孙永钧秘密杀害。后由族人收敛,葬入祖陵。

2010年,赣榆县人民政府实施“慰烈工程”,决定将孙永钧烈士的坟墓迁葬抗日山烈士陵园。打开棺椁时,溃骸的手腕处,锈迹斑斑的铁丝仍在。原状,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可永远无法泯灭的是,孙永钧这位抗日烈士所经历的那场血与火的战斗,以及他从悲壮历史走向不朽的生命,续写了“八百壮士”的又一抗日传奇。

(作者单位:赣榆区政协)

责任编辑 于冰清



刘传钵

巧挖敌堡
将计就计

唐其德 樊 振

刘传钵(1922.10—1995.10),东海牛山人。刘锡九(抗战期间任中共漳宿海中心县委敌工部长)长子。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海陵县敌工部敌占区党支部书记。1946年3月任陇海铁路护路队政治教员。1948年经华野总部分配至中原地区工作,担任开辟新解放区的任务。至1982年12月,先后担任河南省周口市委组织干事,周口市公安局(第一任)副局长,河南省淮阳专区公安处科长,建材工业部地质局保卫科科长、人事处处长,成都勘探大队副大队长,温江地质队党委书记,地质部四川技工校校长,四川省地矿局劳动工资处处长、副局长等职。

刘传钵的原籍是江苏省东海县牛山镇湖西彭宅村。这里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是日伪统治区域,彭宅村隶属于山东省海陵县白河区讲习乡。

1942年,刘传钵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海陵县敌工部副部长周秀民直接领导下,被任命为海陵县敌工部敌占区党支部书记,负责开展敌工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我党对敌斗争绝大多数是在隐蔽或半隐蔽状态下进行的。

1944年,轰动一时的“挖碉堡”“养父子”行动,老幼皆知,欢欣鼓舞。

1944年冬,位于海陵县铁路南北的地主顽固分子纠集一伙土匪、流氓,建立日伪汉奸组织,自立名为“陇海办事处”。由胡四任主任,当地老百姓称这些人为“突击队”。这伙敌对分子纠集在一起,投靠日本,借助伪军的力量,专门从事破坏牛山车站区间的抗日工作。他们疯狂地搜集、捕杀我抗日同志,同时还极其凶残的暗害和胁迫共产党员的亲属,以及为八路军、新四军秘密工作的积极分子。

1945年,这个“突击队”专门在牛山车站以北,离日本鬼子不远的地方,用石块修起一座坚固的碉堡。敌人针对我当时对敌工作的特点,精心设计。此碉堡三余丈高,分三层,只在第二层开了一个窗口式的门,上下进出全靠一架活动的梯子,此梯子存放在二层,“突击队员”住的第二层一区间。顶层日夜派监督岗哨。其底层有几尺深埋在地下。用石块筑成墙基。除一通向二层碉堡内的出入口,别无缝隙。敌人自以为万无一失,用作监禁、关押被抓去的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员。

1945年2月的一天,敌人将石湖村敌工工作人员孙守荣抓捕去。2月6日,尤塘村土匪刘开元做向导,带领“突击队”于拂晓包围了彭宅村,用机枪、步枪密集射击,妄图抓敌工部支部负责人。刘传钵和李洪玉、陈富贵、刘长命等



突围成功,隐藏于村北的白石山。白石山林深草密,泉水清冽,是苏鲁秘密交通线上的海陵县境唯一一座山,易守难攻,为我方人员占据。“突击队”在彭宅村搜查无果,便将党支部成员高兴才的弟弟高兴田(彭宅村人)抓捕,关押在碉堡的底层。

“突击队”未抓到负责人,妄图施展阴谋手段破坏、削弱我敌工工作的开展。敌人捎信给高兴才,要他亲自去牛山站面谈,还厚颜无耻的说什么“保证安全”。此后,敌人又再三声明:“只要高兴才亲自去,就可领回其弟。”同时又通过伪乡长向高兴才面语:“只要高兴才去面谈,保证人身安全。”敌占区党支部分析当时敌我形势,识破敌人的阴谋,指示高兴才拒绝面谈。同时,刘传钵与支部成员——其表兄李洪玉(彭宅、白石岭、石湖、金塘、尤塘联防大队大队长兼指导员)尽力设法营救碉堡内被关押的同志。

堡内被关押的孙守荣等冒着生命危险,乘敌人熟睡之机,悄悄挖洞(挖洞用的“粪叉子”是“突击队”毒打我党同志时折断了的粪叉子头,被孙守荣有心收拾起来,挖洞使用的就是残损的粪叉子头),白天又将挖松动的地方用草遮掩起来,人睡在上面,已经挖到碉堡基部的大石头,因碉堡内条件受限,无法继续再挖。敌占区党支部得知消息后,支部立即决定营救方案。

根据各方面获得的情况,充分利用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决定巧挖碉堡。一天夜晚,刘传钵、李洪玉等人乘敌不备,带领20余人,兵分两路埋伏在碉堡两侧,掩护高兴太、陈富贵、崔永法等同志携带挖洞工具,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堡底层墙基边,找到事先确定好的位置,直接在敌人眼皮下挖洞,先



白石岭西麓

向下挖了三尺多深,又横向堡内挖,刚碰到石块发出响声,岗楼上的哨兵吆喝、咋呼一阵,见无动静便停止。营救人员继续乘敌人未察觉之时,内外配合,神速的将石块搬出,挖通了地洞,救出孙守荣、高兴田、顾公强、闫景科、双先、解江一、桑良毕等8人。整个活动用去了两个小时。等鸡鸣天亮时,敌人才发现堡内在押的共产党员及其他人员早已无影无踪了。

“巧挖敌堡洞”取得如此胜利,人心大快,群众无不称颂敌工人员是“神兵天降”,此事震动很大。

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认为是自己队伍有“内线”。于是刘传钵、李洪玉等人将计就计,放话:“花了很多钱买了粪叉子。”这句话很快传到日伪汉奸耳朵里,于是就将留下粪叉子的两名“突击队员”给枪毙了。在“巧挖洞”之后,未费吹灰之力,又消灭了两名敌伪军。

(作者单位:东海县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抗日老战士 李长剑忆抗战

宋继奎

李长剑,1924年生,连云港市人。1941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海赣边区武工队指导员、海陵县陇海工委秘书、陇海东段铁路管理局人事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区军工八厂政治协理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邮政局党委书记、邮电局局长等职。

2005年,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筹建新馆时,聘我为新馆撰写布展内容,兼做征集革命文物和史料工作。同年10月20日下午,我和该馆工作人员周永红,采访了离休在家的革命老人李长剑。下面是据李长剑老人的口述记录整理(因无音讯,难免有遗漏之处):

我1924年出生,是海州鼓楼街人。1938年,日军侵略连云港。东北军57军112师调来保卫连云港时,112师一部驻新县(今朝阳),向民众宣传抗日。我当时14岁,正住在新县的亲戚家。受到抗日热情的感染,我参加了112师,做宣传工作。有一次,部队发了一块银元,我舍不得花,从新县步行送给住在灌云封庄(今属灌南)姐姐家的母亲,母亲很感动。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她,但我说服母亲,坚持回部队。等我步行回到新县时,部队已开拔了。我打听到部队是向南走的,于是一路打听,追赶部队。途中,晚上就睡在草垛里,饿了就向老乡要口饭吃。追

了三天,一直追到淮阴王营才追到部队。伍志刚(时任中共东北军第112师地下工委书记)见我来了,十分高兴,把我抱起来转圈子,说,没想到你还能追来。

后来由于112师667团团长万毅(中共特别党员)被调走,另调来的团长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顽固派,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都感到不对劲,于是我和另外两个人就离开了东北军。党组织就安排我们到抗大分校学习,学政治、学日语,后分配我到部队当特工干事。有一次,我们抓到了4个俘虏,每人发给一块银元,吃一顿好饭,放他们回家。吃饭时其中一个俘虏问我贵姓,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姓名告诉俘虏,这时正巧下雨打雷,我便随口说,姓雷。后来知道,这个俘虏是灌云封庄人,和我姐姐同庄,他见讨我。他回家以后对我姐姐说:“我见到你弟弟了,他说他姓雷,干八路。把我们抓获后还发路费给我们回家,我以后不干伪军了。”我的母亲听我姐姐说了以后,专门从海州雇了黄包车到我驻地见了我一面。我离家以后,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哪里,母子见面百感交集。

后来,组织上为开辟敌占区工作,派我回家乡搞秘密工作,摸清情况,直接向滨海区城工部书记华诚一(建国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汇报工



作。汇报后我脱下了穿了5年的军装,改穿便衣,只带一支手枪,心中很不具滋味,舍不得离开部队,但要服从组织安排。



华诚一

组织上安排我和刘欣(政治部干事)先到东海县一个卖鱼的张姓家,后通过张诵德(后来任新民区区长)把我送到营中,与人接头。事先约定,我手拿一尺长的高粱秸子,见到来人,用暗语问:“四哥,你家住什么地方?”来人回答:“我家住”(地方)。”接上头以后,安排我到城后纪良甲开的杂货店里当伙计,做掩护工作。我的生活费怎么办?敌占区不用解放区的钱,只好从解放区运来几百斤花生油,卖了做生活费。在杂货店里,开始我不会称秤,也记不清各个“酒瓶子”容量大小,也不知敌占区货币的兑换值。因此,被一个海州来这里开裁缝铺的裁缝看出了破绽。一天,他对我说:“我看你不是做生意的。”他用手比划出“八”,说,“你是这个(指‘八路’)。”我知道自己已被这人识破了,弄不好要坏事。于是,就多次向他宣传抗日,做他思想工作,动员他到根据地去。后来,终于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介绍他去根据地被服厂做了裁缝。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也使我解除了可能会发生问题的隐患。

在做了一段秘密工作,摸清敌情以后,组织上派我到封庄,找铁秋(抗战时曾任海陵县宣传部长、海陵县长,解放后任鞍山市市长等职)。他派我到

敌占区,在苘庄湖以东、沙河以南、陇海路以北,开辟新区。交代我要完成三项任务:一、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二、将日伪乡保政权改造成为我们服务的“两面政权”;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搞起武装,拉起队伍。



铁秋

在发展党员方面。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纪良甲,我曾在他的杂货店里当伙计,做掩护。然后发展的有:侯同发,解放后在安徽任阜阳地委书记;孙以山,解放后在东海县土产公司做领导工作;最后发展了吉树新,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后来在上海高级法院工作;还有武洪典,后来他被误杀。我和姓马的一起发展了李华,后来他牺牲了,家住杨魏庄。我和许耀林(抗战时曾任武工队指导员、大队政委、海陵县新民区区委书记等职。建国后曾任新海连市市委书记、苏州市委副书记等职)一起发展了杨琪入党。当时许耀林对杨琪说,你的另一个介绍人是李长剑,但他没有告诉我,他已对杨说过。因此,文革中,连云港市几次派人到上海找我,调查杨琪入党问题,我都说杨琪是党员,因为党员开会时我见过他,但杨琪不是我介绍入党的。因此,文革中就说他是假党员。直至文革后我问杨琪,才知道是许耀林告诉他,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是一个误会。

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建立党组织。经上级批准先成立新民区党支部,后来成立新民区委,许耀林任书记,我和刘欣任委员。按照上级布置的“搞



起武装,拉起队伍”的任务,我们开始时组织起有 18 个人的队伍,名为“海陵边区武装工作队”,队长是沈斌玉,是位长征干部,江西人;我为书记。下面分为三个组,每组 6 人。一是武装斗争组,由姚有香负责;二是政权工作组,由商“(名字记不清了)负责;三是关系工作组,由我兼负责人。经讨研究,确定了今后的三项任务:一、继续发展党员,壮大队伍;二、建立基点村,改造伪政权;三、发展和利用“关系”,开展对敌工作。

改造伪政权,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抓进去:事先与倾向我们的乡保长说好,晚上有意识地把他们“抓起来”,送到解放区学习一个月后再放回来。这样,既可以使他们思想进一步转变,为我们服务,也可以使敌人认为他们是被八路抓走的,不怀疑他们。

第二种,请进去:在安全保密的前提下,请乡保长到解放区参观,感受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和根据地的新气象,使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有新的认识,从而愿意为我们服务。

第三种,安排进去:就是把我们的关系安排去干乡保长。例如,武洪典,是杨魏庄人。他的叔父在地方上是个很有威望的保长,年纪已大。我们就做他叔父的工作,请他把保长的位子让给他侄儿武洪典。他看是让给自己的侄儿,也很愿意。这样,这个保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在发展“关系”方面,我们也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丁怀斗,在铁路工作。我们发展了这个“关系”以后,他起的作用很大。他为我们刺电线,破坏敌人的电话线,扒火车,搞物资。一次,他把敌人的酱油粉掀下火车,以为是粮食;但是酱油粉对改善我们部队的伙食也很有用。像这样的“关系”还有一些。

我们武工队除自己开展武装斗争以外,有时也要配合部队参加战斗。在海陵反“蚕食”的斗争中,有一次,在小屯战斗中,离董马庄三里路的地方,我们部队六连被日伪军包围,我们闻讯就去支援。六连指导员姓邵,改名肖印。他当时负伤很重,托我办一件事,说他牺牲以后,等抗战胜利了,请我跟他家

里人说一声,说他是为抗日、为人民解放而牺牲的,虽死无憾;并告诉我,他家住在水阳县某乡某村。后来我忘记了他说的家乡地址,一直没能跟烈士的家里联系。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内疚。

我们海陵边武工队在抗战中还有许多事情,因为时间长,一时想不起来了,有可能还有记错的地方,还可以请其他同志回忆回忆。

1945 年抗战胜利以后,成立海陵县海工委,我任秘书。1946 年至 1947 年的一段时间,我到军政大学学习。学习后先叫我搞兵工厂,后来调到滨海区交通部搞铁路工作。到交通部报到时,原来是叫我到邳县站当站长的,交通部的组织部长原来是 57 军独立旅的,他见我原来也在 57 军独立旅干过,对我很亲热,就把我留下搞人事工作,任海陵段铁路管理局人事科长。后来组建军区印刷厂(在济南)时,叫我当厂长。1949 年接管上海时,叫我接管上海市邮政局,任党委书记、邮电局局长。去接管时,我带去三件东西:一件是部队发的一件白衬衣。那是我脱下军装去搞敌工工作,换穿便衣时留下做纪念的。看到这件衬衣就想起了 5 年的部队生活;这件衬衣已捐给东海县安峰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另一件是一个牛皮包。这是我当特务连指导员时,放书和文件用的,一直随身带。另外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万毅团长穿着缴获的日寇军大衣,骑马照的;另一张是我在 1939 年的单人照。当时斗地主,在地主家缴获一个照相机,大家互相照相做纪念。这两张照片也捐给了安峰山革命烈士纪念馆。

以上是 2005 年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时,采访抗战老战士李长剑老人的口述历史。倏忽 10 年过去了。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特将口述记录整理发表,既是对李长剑老人的安慰,也是为永远不能忘却的抗战,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

(本文作者为连云港市公安局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于冰清



黄窝村抗日记忆

胡可才

北云台群峰环抱,苍松翠柏郁郁葱葱,主峰大桅尖和邻近山峰的罅隙里,溢出几道涓涓细流,经数公里的曲折迂回,终于在低洼的地方汇集成一条常年有水的小河,在青山绿水的浸润下,有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古村——黄窝。我家和其他人家一样,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与世隔绝的大山里,靠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和世代传袭下来的技能艰难的生活着。说到这里抗击日本的历史,我们胡家最有发言权了。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600 年前,大规模的有 3 次,一次是明朝万历以前的,历史上称“抗倭战争”,中学历史书上曾经以“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为题目详细叙述。据家谱记载,海属地区的明朝前期移民,除苏州阊门“红蟬赶散”的十三家(其实是十三族)以外,大部分和抗击倭寇有关,民族英雄戚继光的部下有个叫施琅的抗倭将领,他的一支后裔现在还定居在灌云一带。我们东海敦素堂胡氏家族的第一代祖胡海原籍安徽,于明建文二年(1400 年)授“武德将军”,明永乐五年(1407)年因东海急缺官员,以“正千户”(官衔名,正五品)身份调驻南城东海所。与胡海同时镇守东海所的有千户八员、镇抚一员、百户十员,“正千户”一职只有 5 员。千户胡海的后代,前四代为单传,均驻守南城世袭千户一职,第五代四子,其中二、三两子迁山东防海。长子鉴世袭正千户,鉴有六子,次子胡麟,就被封在黄窝一带。这里的海防设置,在明朝后期有较大的变化,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取得关白权位,于万历二十年(1592 年)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关白之乱”),从历史上明朝政府将南面的云梯关把总移东海凤凰城(即南城),同时增设水陆三营驻东海这个事实可以看出,此时东南沿海的抗倭已经告一段落,战事向北转移,苏北沿海形势十分严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胡麟及其子孙,住北云台山主峰大桅尖下黄窝一带,这里又是“陡水”(即岸边水深较大,能停泊较大船



舶),东临大海,西控五羊湖。明朝时倭寇经水路侵犯北云台一带村落有两条路可以登陆,从黄窝村北炮台嘴(志书上称“东峡口”,因安放炮台及大炮而得名)到村南小山嘴(即头道“梯岸”以下)这片水域水深较大,有个叫“码头湾”的地方,是唐朝打高丽的运兵港口,满潮时进出外海的大船也可停靠。著名日本僧人圆仁在其日记里记载从这里取讨淡水,充分说明这里湾阔水深的自然条件。这里向南有个叫“牛屁”的地方可以入五羊湖,这里水浅,只能行小船。因此倭寇从外海进入后,从正面佯攻,派小股部队,绕道牛屁,突袭五羊湖一带的村落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和“声东击西”的兵法吻合。现在大桅尖东,黄窝山向南经宿城到云山,故五羊湖还有一条古路,即为当时陆上穿插之用。我们还看到位于海州湾北侧的山东日照岚山的县志,上面也有胡海镇守的纪录。明朝海州湾沿海的抗倭斗争,磨练了胡氏族人的意志。先辈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他们的子孙后代。

1937 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在 20 年前修建核申公路和港务局东疏港码头之前,我们还可以清楚的看到沿海一带有好多防御战壕,深在 1 米以上,断断续续的,其中红石嘴一带的最为清晰,这些战壕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万毅带领 667 团官兵挖掘的。这是抗敌最前沿,我还看到在原黄窝大队队房后面的石洞里,有一条腿骨,明显是抗战勇士留下的。在黄窝山下,大桅尖南侧大龙岭一带、大桅尖北侧沿飞来石—牛岭—旗台嘴一带都有战壕,我们小时候随大人们去山上拔茅草、刨桔梗,还见到子弹壳和一些铁质碎片,晚上为桔梗去皮、为茅草摘根时,会发现有光亮闪烁,很显然是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土壤含磷发出的磷光。住在黄窝水库南侧的夏双田老人(已故)夜晚睡不着,多次看到“鬼火”在前面的半山腰,这些都是在这一带发生鏖战的证据。

我的大妈是墟沟龚大基名门之后,她生于 1905 年,她和大哥胡可仁(时 13 岁)以及侄吕山的夏春田回忆:侵略连云港一带的日本鬼子,一共有三批:第一批比较早,主要朝居民区和有防守的地

方进行轰炸,应该就是 1937 年 9 月 20 日前后,胡可样家的四合院,南面的厨房及过道、东厢房被炸坏。紧靠这里有一块光光滑滑的大石头,大妈的两个闺女在石头上玩耍,长女胡可美时年 8 岁,第一次看到飞机觉得特别新奇,用手指着叫喊,结果被炸瞎了眼睛。二女胡可英当时 4 岁,趴在石头下面将头伸在洞里,腰被炸伤,黄窝水库里面的白宝山大楼和其他一些附属建筑也是在本阶段被炸坏的。在水库北的一些山上,有一些大坑,如老王家 and 老丁家的吃水井,就是炸弹炸破土层积水形成的。

日本鬼子经过狂轰滥炸后又回到海上。事隔八个月,即 1938 年 5 月 19 日,为了配合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徐州的进攻,日寇迫切需要占领陇海铁路,于是派军队从连岛和孙家山登陆。因为鬼子长时间在海上活动,村民们就把这次登陆称“日本上岸”,后来就把“日本上岸”作为这场战争的代名词。从连岛登陆的日本侵略者,窜到黄窝,村民们闻讯,迅速上山,躲进山洞里。鬼子进村发现大部分村民已经跑光,就杀害了未能来得及撤离的张前元 20 多岁的妹妹和张步香 80 多岁的母亲,随后进行搜山。躲在石洞里手无寸铁的村民,大气都不敢出,胡可军当时只有 3 个月大,鬼子搜山时发出“哇哇”哭声,母亲在危急时用乳头堵住孩子的嘴巴,等鬼子走后,孩子被憋得只剩下一口“游气”,后经众人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黄窝村西的大桅尖是北云台最高峰,山脚就是港口,陶庵的丫髻山正对着鹰游海峡,这两处作为战略要地,历代海防都特别重要,以抗击倭寇著名的胡海墓就葬在丫髻山麓,而黄窝则是胡海五世孙胡鹰的封地。到抗日战争时期,开始驻在大桅尖一带的是由税警部队改编的“游击第八总队”,而税警部队和现在的警察一样,在军人素质、训练、武器装备等方面显然落后于正规军,有些将领也没有多少战争经验,只能用作临时应付。住在紧靠大桅尖下边吕山的夏春田老人回忆:保卫大桅尖的军人先后换过 4 次,防守鬼子第一次进攻时的队伍是警察改编的(将领不知姓名),听到枪响就“缩头”,战斗力



明显不行。第二次派来国民革命军(应该是国民革命军57军112师336旅672团,团长叫白喜禄),战况有了明显改变。1938年8月2日,日寇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舰艇上倾巢出动,向大桅尖猛扑,国民革命军拼命反击,可日寇疯狂硬冲,激战一天,大桅尖还是被日寇占去。看到这种情况,在孙家山一带的军队(应该是336旅667团,团长为著名抗日将领万毅)很快讨来增援,形成联合包围的局面。当时夏春田老人还不到20岁,他在暗洞里亲眼看到当时肉搏的场面,只见中国军人越战越勇,小鬼子“哇啦哇啦”叫着拖枪朝山下跑。在鬼子狼狈逃跑后,夏春田还捡到鬼子用过的军用水壶一只和单被一条。那次战斗不久,沿海一带的制高点几乎都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在大桅尖驻守的军人为了迎接新的战斗,又“开拔”了,阵地于1938年9月重新交给“游击第八总队”镇守,但这次来的军人明显和第一次驻守的不一样,听说首长姓胡(应该是抗日名将胡文序,年轻时练过武,力大无比,有多次指挥作战的经验,灌云一带还有专门歌颂他除暴安良的石碑)。9月24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从高公岛向大桅尖进攻,“游击总队”士兵在胡将军的领导下,为了洗雪前次失利的罪名,个个奋勇杀敌,鬼子又一次被打回舰艇。这次战斗后阵地被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9军33师接替。此后4个月,鬼子没有再来侵犯大桅尖一带。

1939年2月28日驻守大桅尖一带的防守部队全部撤防,不久日寇彻底占领了连云港。驻黄窝山的日军集中在旗台嘴,这里可以俯瞰鹰游海峡,又位于黄窝村民去连云港的要道上,便于监视过往村民及船只。据张程元、胡可耕(已故)回忆,当时的黄窝村民主要靠捕捞和打柴为生,也有少数给日军干活,有的在日军的食堂里帮厨,有的给日军弄“哨船”——即日军在海上设立的巡逻警戒船只。虽然村民们惧怕日寇,有时为了发泄对日寇的仇恨,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会采取一些机智的手段对抗。我大妈一家5口全部靠着山打柴为生,为了不把柴草卖给旗台的日本人,从没有道路的牛岭山翻过到连

云港(当时叫老窝)卖掉。有一天村民胡可耕和胡殿全从老窝卖草回来,到旗台嘴下面,见有一日本兵牵着狗在路上慢悠悠逛着,也没带武器,煞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用扁担和镰刀打伤了他们。当他们抄小路跑到岭下时,后面传来一阵枪声,此时他们已经脱离了危险。还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在汉奸的陪同下,到村里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村民胡殿标抱起一个20多斤的石头砸向他们,鬼子猝不及防,脚面被砸的鲜血直流,直喊“八格牙路”掏出手枪,因为被人群围着,没有找到“肇事者”作罢,打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单个日军去村里耍威的了。

我大妈回忆,在旗台的日军快要退出的前两年,看见在磨刀堂一带经常有日军烧起大火,还把一些没有死挺的人手脚捆紧,然后摆讲火堆,有男的也有女的,开始还以为是战俘,后来发现还有一些小孩。我堂哥胡可仁跟日军队伍里的一个朝鲜人认识(当时朝鲜已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有不少朝鲜青年被逼入伍,充当“雇佣军”,驻扎在墟沟的鬼子军营里也有不少,他们普遍反对战争,希望和平,有的还和被欺凌的中国人秘密交友),这个朝鲜兵趴在胡可仁的耳朵上偷偷说“虎烈拉”,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如发现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蔓延。所以鬼子发现一个烧死一个。我大妈听到这消息笑着说:“真是人不报天报啊!”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已渐渐尘封。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倍加珍惜和平的国际环境,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海滨高级中学)

责任编辑 于冰清



连云港抗战大事记(五)

(1943.01—1943.12)

本刊编辑部

1月

30日,淮海地方主力第3支队第7团和路南东海县大队向城头据点发动进攻,与据点内线巧妙配合,拔掉了城头据点,俘获城头伪军1个中队。

赣榆县大队与独立大队合并,扩编为海赣独立营,刘成宽任营长,县委书记邱也民兼政委。

原新四军第9旅民运副科长徐竟受淮海军分区吴集情报站派遣,潜入新浦伪军内部开展工作,因身份暴露被捕,壮烈牺牲。

2月

2日,敌伪在淮海地区进行大“扫荡”。

月初,淮海第3支队第7团和东海县大队,包围了小街据点,切断其粮草、物资供应。一周后被攻克。

8日,日军第17师团之第54联队约2000余人,伪军第36师第72旅李实甫部2000余人,进犯至新安镇以北地区。日军山轮大队进入响水口,伪军第36师第71旅徐继泰部在响水口一带集结,以配合日军大“扫荡”。

20日,中共淮海地委发出《关于准备春季反“扫荡”工作的紧急指示》。

国民党江苏省常备二旅旅长徐继泰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投降日伪,被任命为“四县(涟灌沐阜)剿共指挥官”。

3月

17日拂晓,新四军3师51名干部(包括家属等)乘木帆船赴延安途中,在赣榆县小沙东海面与敌汽艇遭遇。激战竟日,第3师参谋长彭雄、第8旅旅长田守尧等16位同志壮烈牺牲。

中共滨海地委、滨海专署和滨海军分区部队开

展大生产运动,在赣榆县柘汪至响石村的海滩上开拓盐田2000多亩。

赣榆县抗日根据地废除募兵制,试行参军制。县委在马鞍山召开动员参军会议,每区初步确定参军人数在20人左右。

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潜伏在从青岛开出的满载白布的敌商船上,当船行驶至海上时,将护船日军灌醉,然后将船强制行驶至柘汪口解放区。

海陵县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县委在横沟建立生产基地,要求干部群众化,带头参加劳动,发动群众开荒种地。

八路军教导2旅老4团配合海陵县各区武装,采取统一行动,将东从白塔埠,西至阿湖之陇海铁路东段沿线的伪乡、保、甲长3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战争形势、爱国主义教育,对个别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分子给予严惩。

4月

8日,新四军第3师副师长张爱萍率第8旅第24团第一、二营,首歼响水口以东和陈家港以南辛湾、马家沟之敌。5月3日凌晨3时,第8旅第23团、第24团、旅特务营,第7旅第19团等向陈家港发起总攻,一举攻克淮北盐场重镇陈家港。

东海县大队配合伪军中的内线,拔除万匹据点。

新四军第3师第10旅遵照上级指示,命令第1支队第3团及第2团一部结合保卫麦收,向六塘河南岸之许五庄伪军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攻克了该据点,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攻克了六塘河北岸的葛集、石门口、汤湾等据点,打开并稳定了灌云地区局面。



滨海地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撤销中共滨海地委,建立中共滨海区党委,符竹庭任书记。与区党委同级的行政机构仍称专署,专员谢辉。撤销滨海军分区,建立滨海军区,陈十槃任司令员,万毅任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符竹庭任政委。

赣榆县在谷阳区进行村政选举试点。选举村长 1 人,副村长 3 人,村政委员 5 人。

中共灌东工委改组,鉴于陈少新的右倾错误等表现,淮海地委决定将其调出灌东,调淮海第 1 支队第 3 团长孙良浩接任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

5 月

16 日,淮海军分区集中兵力发起汤沟战斗,在击退沐阳、淮阴增援之敌后,于 18 日解放汤沟,接着扩大战果,攻克据点 20 余处。

下旬至 8 月 20 日,新四军第 3 师发动夏季攻势,在六塘河两岸攻克 51 个据点,消灭敌人 5000 余人。

6 月

赣榆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村政选举工作发出通知,要求各村抓紧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出能真正代表各阶层利益之人,防止村长包办现象发生。

7 月

7 日,中共滨海区党委召开大会悼念小沙东海战烈士。

淮海军分区第 3 支队第 7 团攻克桑墟据点,团长宋耀南在战斗中牺牲,由孙东初继任团长。

12 日,第 115 师师部由赣榆县大树村移驻莒南县李家花园。

吴书任灌云县委书记并兼灌云县总队政委。县委、县政府机关在李恒庄至吴集一带活动。

8 月

4 日,驻新浦日军某部调驻青口镇,在青口镇南门市场 3 次施放毒气,致使 30 余名平民中毒,死 2 人。

23 日,57 军独立旅改编为滨海军区海陵独立团,江湖任团长,海陵县委书记郑子久兼政委。

淮海军分区第 3 支队第 7 团团长孙东初牺牲,由崔维杰继任团长。

八路军教导第 2 旅老 4 团第 3 营,对敌开展经济战,夜袭乔团、尤庄、阳春、阿湖等地敌伪收猪

点,赶回被敌抢掠的数千头猪。

9 月

赣榆县黑林乡秦埠地在个体小商贩基础上,组织成一个供销合作社,社员以花生或现金入股,主要经营花生、煤油、火柴、烟等。这是赣榆县供销合作社之始。

10 月

八路军教导 2 旅第 6 团何万祥连长只身夜袭墩尚伪区公所,活捉伪区长。

奉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 3 师第 8 旅第 23 团从盐阜区调入滨海地区划归滨海军区建制。团长胡继成,政委王德贵。

11 月

4 日夜,海陵独立团及民兵在滨海第二军分区一部主力配合下袭击黄庄伪据点。经两昼夜激战,于 6 日下午攻克。毙伤敌伪军 40 余名,俘伪军 10 余名,缴获步枪 20 余支。

19-22 日,中共滨海军区主力及海陵独立营在陈十槃、符竹庭指挥下发起赣榆战役。此役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 36 师第 71 旅,俘伪旅长李亚藩、伪团长张星三及所部官兵 2000 余人。李亚藩、张星三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击毙。

23 日晚,滨海军区第 4 团一部在海陵独立团及民兵配合下,包围海陵县境内的石文港据点。据点内伪军 150 余人于 26 日晨全部反正投降。

26 日晨,日伪偷袭滨海军区机关驻地——赣榆县马家旦头村,中共滨海区党委书记、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不幸殉国。

中共滨海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部,部长华诚一。中共赣榆县委成立新海连城市工作组。

月底,八路军教导 2 旅 6 团调防滨北地区。苏北伪军再次实施 3 个月“治安肃正”计划。

12 月

20 日,淮海第 1 支队第 2 团包围了伪军安在灌东腹地杨圩的据点。伪军 1 个中队被全歼,中队长薛志信被击毙。杨圩据点拔除后,扭转了灌东被不断蚕食、伪化的局面。

是年,东海县隶属伪淮海省。次年伪东海县公署改名伪海州市,仍隶属于伪淮海省。



历史能真实 胜利能诗篇

——读《连云港抗战志》有感

蔡立志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到来之际，由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及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编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连云港抗战志》正式出版发行了。接到这本书我爱不释手，夜以继日地将之读完。读完感慨良多。首先对这样一本断代抗战专志的问世表示祝贺；其二，对编著者创造性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第三，我们共同为连云港市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出版这部抗战类志书而欢呼。

《连云港抗战志》编著者，以独特的眼光，客观的视角，把连云港的抗战斗争放在全中国大抗战的背景下进行描述，因此使连云港的抗战活动成为全中国抗日战争大

战场的有机部分，使连云港的 8 年抗战成为全国抗战大局的有效组成部分。基于这样一个客观认识，通过大量的史实和文献，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抗战期间连云港地区的地理、政治、军事等情况，全面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在连云港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



2015 年 9 月 8 日，市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九三纪念”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会上市领导向有关部门赠送了《连云港抗战志》



翔实地记载了抗战期间共产党、国民党、爱国人士及中外抗战人士等无数仁人志士在连云港地区的战斗史迹,真实地再现了连云港抗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该志激励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使人汲取精神力量,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建设美好家园,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区位优势,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部志书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胜利的诗篇。我们为《连云港抗战志》的出版发行而叫好。

一、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地市级抗战志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虽然连云港抗战只是中国抗日大战场中的一小部分,但该志编著者把连云港抗战放在全国抗战的大背景下描述,凸显了连云港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作用。1937年8月,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先后调遣数支部队守卫连云港,特别是国民革命军第57军112师667团在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万毅团长的率领下,与侵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争战,成功地阻击了日军从连云港登陆计划,迟滞了日军侵华的步伐,从而使连云港抗战在全国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该志编著者还把抗战8年的断代史放在志书的框架内,按照“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的写作要求,将概述、大事记、地理、政治、军事、日军侵华事件、人物、设施、附录等诸项按照章、节、目、子目的层次进行描述,开创性地讲行史志结合,以简洁凝练的文字,图文并茂的结构,真实、全面、客观地介绍连云港抗战历史过程,完成了国内地级市第一部抗战志的编著。读后让人感到亲切、自然、可信,有很强的可读性,难能可贵。无怪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章百家中肯地说:“《连云港抗战志》的编著出版,是党史研究与方志研究有机结合的大胆尝试,连云港市在全国地级市率先出版抗战

类志书,标志着该市在抗战史方面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重点突出,特色鲜明

《连云港抗战志》以志书手法撰写抗日历史,虽然比较困难,但编著者不畏困难,横排竖写,设置了地理、政治、军事事件、人物、设施六章27节98目,在给名目繁多、内容浩瀚的编著过程中,该志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在第一章“地理”中,巧妙地设置了自然环境和军事地位两节,这就把连云港抗战摆到了全国抗战的大格局中变为可能,突出了连云港抗战的重要性。在第二章“政治”和第三章“军事”中均对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日伪势力作了客观的介绍,其中对国民党在正面抗击日军、保卫连云港战斗中的六支正规军及国民党各县地方武装均以抗日队伍的面目加以介绍。对共产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及抗日民主政府的各支地方武装亦作了全面介绍;还对15支日伪武装也作了认真的介绍。一律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笔触,对连云港抗战历史加以记述,使人心服口服。其中对五里槐伏击战、青口战役及其十八勇士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了重点描述,特别是青口十八勇士,一举享受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奖励的“荣誉旗”待遇。确实彰显了连云港市的抗日战争在全国抗战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还有在“人物”章节中,全面地介绍了敌我友三个方面的重要人物,并列有抗战英烈传,其中烈士朱爱周、国际友人汉斯·希伯分别被国家民政部列入第一批、第二批烈士名录。这些都说明《连云港抗战志》所反映的内容及事迹特色鲜明,影响重大,是一部反映真实历史的良志。

三、内容丰富,手法多样

《连云港抗战志》洋洋50万字,16开本500多页,真可谓内容丰富,涵盖全面。除志书体量较大,其表现手法也多种多样,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例。该志以志为主,述议结合,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设卷首图,随之图、表。选取了党政军领导重要战役图、纪念设施图及相关地



图,附录了抗战亲历记及抗战歌曲,还列有抗战英烈传略,抗战烈士表。纵观全书,配备彩照 58 幅,黑白照片 143 幅,列有各类表格 58 张,各类地图 12 幅,抗战遗址目录遗址数 86 个,抗战英烈传列有 82 名传略,抗日烈士表列有抗日山烈士名录 3576 人,列有中国共产党党政军领导人刘少奇、罗荣桓、黄克诚、惠浴宇、刘瑞龙、洪学智等 143 名领导干部的简历,还有陈百川、丁治磐、王公屿等国民党抗日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 17 人,还有汉斯·希伯、金野博、罗牛特 3 名抗日国际友人,另有陈少新、郝鹏举、李实甫、周法乾等汉奸 10 个和日本侵略者头目板田静夫、冈田助、龙本信藏等 10 个。在附录中还载有万毅、肖华、张克辛、孙良浩等抗日英雄 18 篇回忆录,更录有抗日歌曲 29 首。丰富的内容,多样的手法,使志书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内容更加充实丰满,给人以过目难忘的效果,增强了志书的条理性、实用性及资料性,具有很好的存史价值。《连云港抗战志》不仅是一本宝贵的历史资料,更是一本含有丰富政治营养的佳作,值得一读。

四、存史咨政,开启未来

畅读《连云港抗战志》使人酣畅淋漓,心潮澎湃,她让人对连云港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刮目相看。人们对连云港市为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无限自豪、对连云港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由衷敬佩;人们感受到抗战英烈们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与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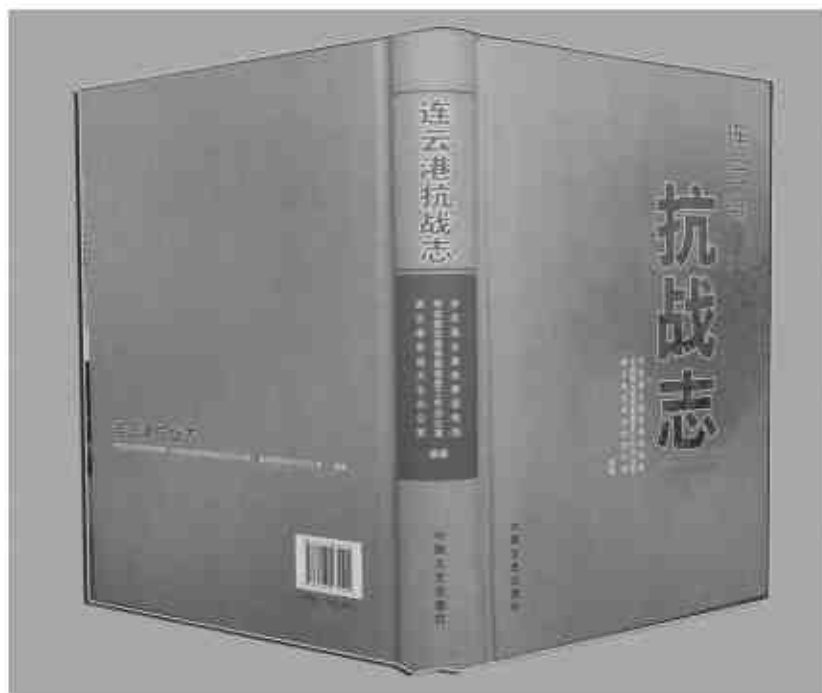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争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通过学习《连云港抗战志》,更好地认识和平,珍爱和平,争取和平,开创和平。我们要

以史为鉴,发挥史志存史、咨政、教化的功能,要一代一代人为之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是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好形势下,更要通过学习《连云港抗战志》,重温中国梦,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灿烂的明天。

作为一部全方位介绍海属地区抗战志书甫一问世,便受到了全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美中不足的是志书有些内容比较缺乏,加之时代久远,无法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搜集,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尽管如此,《连云港抗战志》仍是一部特点鲜明,长处很多,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严谨的科学性,丰富的资料性以及通俗易懂的可读性,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良志佳作。我们应当向这本志书的编著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作者单位:市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

责任编辑 于冰洁



《连云港抗战志》



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共建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平台

——关于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的研究

刘成文

“一带一路”战略体现出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作,还包括政治、文化、军事、教育、科技等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其他交流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走在经济等合作的前面,而且比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更为持久、长效。

一、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的基本特点

俯瞰中国版图,新丝绸之路——新亚欧大陆桥横贯中国东中西,它所经过的城市历史最为悠久,文化特色最为鲜明,它们犹如颗颗耀眼的珍珠,展现着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1.古:历史文化名城众多。由于新亚欧大陆桥穿越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土高原,因此一批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城市与它一起共享荣光。在国务院分三批公布的126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位于新亚欧大陆桥附近的城市就有19座,分别为:第一批公布的开封、西安、洛阳;第二批公布的安阳、徐州、淮安、商丘、平遥、韩城、敦煌、张掖、武威;第三批公布邯郸、咸阳、汉中、天水、郑州。以及“前三批”之后不定时增补的叶鲁番、伊宁。

2.特:城市文化特色鲜明。这些城市,有的曾是王朝的都城,如西安、郑州、咸阳、洛阳、开封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化古都;有的曾是当时的政治、经济重镇,如徐州被称为“五省通衢”,洛阳素有“九州腹地”的美称;有的曾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如古称“陈仓”的宝鸡,因“金城汤池”之誉而称金城的兰

州;有的因拥有珍贵的文物遗迹而享有盛名,如被称为“羲皇故里、娲皇故里、轩辕故里”的天水,被誉为“旧石器时代”代表的安阳;有的则因特色文化、旅游胜地而著称于世,如拥有“牡丹甲天下”的洛阳,山海相拥、花果飘香的连云港,异域风情的乌鲁木齐、叶鲁番等。

3.创:文化发展步伐加快。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文化产业正式列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契机,陆桥沿线城市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会展旅游、信息服务等文化产业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局面。如江苏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一批有规模优势、品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和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的市场主体,在动漫产业方面,就拥有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四个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占全国国际级动漫产业基地总数的24%。山东省将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按照“三个产业集聚区、三大文化产业园、三大文化产业带”的框架展开,最终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结构合理、效益显著的产业发展总体格局。陕西省构筑了以西安为中心,关中、陕北、陕南三大板块为联动,以文化旅游、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娱演出为发展重点,以一批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和文化企业为支撑的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格局,推动文化跨越式发展。

4.联:区域文化逐步形成。由于历史的原因,陆桥沿线城市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它们根据交通枢



纽、资源状况、地理位置,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在沿桥地区建立起了若干个经济发展区,这种经济发展区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缘、人缘、文缘基础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辐射力。如以连云港为中心的东桥头堡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经济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西部经济区等。

5. 争当一带一路领头羊。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共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旋即“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建设成为当下“热词”,点燃各方热情,各个城市都先后发声,表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和地位。陕西省强调要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加快建设内陆开发开放高地。新疆紧紧围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推进全方位开放。宁夏要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甘肃省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青海提出,要努力把青海打造成新丝绸之路的战略基地和重要支点。

二、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的难点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之间交流合作的不断增多,日益密切,古老的丝绸之路正在加速变成国际性、开放型的交通、经济走廊。合作交流、发展共赢是城市合作的永恒主题,但是合作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调动区域内各地方、各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1. 城市之间积极性差异大。对城市合作最大的威胁是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城市合作的现状是:发展较落后地区积极响应并推崇区域合作,以此改善自身经济发展落后的劣势。经济较发达地区实则对此并不积极,一是因为作为发达地区在合作的成本上会承担很大一部分,二是合作的收益分配不平衡,没有形成多投入多收益的良性预期。如果在区域内不能合理的协调各方利益,势必不能形成内部合力,更可能会阻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

2. 城市文化结构趋同。就自然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很多城市具有相似性,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都处于同一阶段,所以它们在文化

结构上也非常相似。因此就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以东部城市连云港、日照、青岛等为例,如1994年11月,侯月(山西侯马至河南月山)铁路建成通车,向东的最终点是山东日照港,这是与陇海铁路平行的一条铁路干线,新亚欧大陆桥东段呈现出日照与连云港双桥头堡的格局。青岛、天津等大城市也先后提出要当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仅就山海城市文化方面,自连云港提出要建设“山海相拥知名旅游城市”后,青岛提出要开展“山、海、岛、市”齐鲁山海文化之旅活动,烟台提出要举办山海文化节,秦皇岛提出要“建设山海间的长城文化高地”。

3. 难以形成合理的激励机制。利益分配问题是我国城市之间合作的最大难题,影响各成员的积极性,甚至决定着合作的成败。如有的城市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举办辐射全线的文化旅游展示活动,虽然参会的城市众多,但是并没有多少合作的成分,举办城市都是独自承担了整个活动的工作,由于缺乏长效机制,这种活动表面上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实际上缺乏内生动力、难以为继。

4. 缺少科学的约束机制。在城市的合作过程中,时常发生成员利益冲突的时候,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阻碍着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城市之间签订的一些协议文本大都比较空泛,原则性强调一下,没有形成适当而严厉的制度来保障区域合作中各方的利益。

三、连云港在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中的作用发挥

当前,陆桥沿线城市都在抢抓“一带一路”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但是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在打造东中西区域文化合作的龙头城市方面,还没有破题。连云港必须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城市文化合作这一主题,以建设特色文化城市为目标,创新城市文化新品牌、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塑造城市新形象。

1. 高端规划,组织推动。在东中西区域城市文化合作中有所作为,首先要整合文化资源,发挥自身独特的人文优势,因此高起点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方面非常重要。连云港文化源远流长,但与“一带一路”战略关联度最为密切、最具有开放度的就是举世公认的“西游文化”。在沿海城市中,



连云港是唯一以“西游文化”作为主打品牌的城市。因此首先要科学制订“西游记”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划,借力外脑,邀请对中央决策层有影响力的“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西游文化”与“丝绸之路”文化的密切关系,确立连云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地位。其次要把“西游文化”元素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营销之中,集中精力做大、做强、做美“西游文化”,不断建设既有“西游文化”特征又有新时代气息的标志性景观。使“西游文化”进城、进海,入目、入心,把连云港沿海建设成为新世纪的“东方傲来”。

2.规范服务,国际范儿。要借助举办大型的国际性活动、召开大型国际会议,加大连云港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推广力度,使连云港与青岛、上海等海滨城市一道名扬中外,成为国际性会议的首选之地。在城市管理上,城市道路、机场、火车站、码头及海滨景区、公园的路牌和标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要符合国际标准,服务方式、服务质量要具有国际水平。城市管理突出洁净、整齐、规范,沟通交流突出关心、亲切、体贴。在政府服务上,要不断增强政府相关部门建设国际性海滨城市的意识,通过创建国际化的政府管理模式,优质高效的服务质量,使来连企业和客人产生宾至如归的心理感受,不断增加连云港的亲合力和感召力。

3.举办会展,打造品牌。会展旅游是借助举办各类大型会议、研讨会、论坛等会务活动而开展的合作形式,是当前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个重点。具体做好以下重点项目:一是建设大陆桥合作论坛会馆,定期举办大陆桥沿线城市论坛,与中西部、长三角等区域内的各个城市加强交流合作,并拓展与日韩交流,全力培育2—3个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论坛或大型会议品牌。二是充分发挥国际会展场馆的作用,利用我市已经建成的国展中心、工业展览中心等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商务会展产业,吸引世界性组织、国际行业协会、著名跨国公司和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大型展览企业来连设立分支机构或组建展览公司,将连云港打造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会展经济的商务副中心。三是实施高新产业产品展销战略。举办大型高端的国际、国内同行业展销会或博览会,以中国(连云港)丝绸之路国际物流博览

会为载体,以物流、医药、太阳能、风电设备等为抓手,打造中国港航物流、新能源、新医药产业的展销基地。

4.加强宣传,旅游营销。旅游宣传促销是拓宽客源市场,塑造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旅游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营销合作联盟。加强与国际、国内旅游组织、旅游客源地的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旅行商、新闻媒体和中介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和发展旅游营销联盟,实施互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推广措施。二是实施立体促销战略。在传统活动宣传、专题宣传、会议宣传、资料宣传的基础上,打造24小时“连云港旅游在线平台”,提供景区(点)、宾馆饭店、旅行社、名特商店、博物馆、定点演出等内容的多层次旅游信息查询,并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网上促销活动。三是加大节庆促销力度。精心策划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节庆活动,争取举办一些国际性、全国性会展和体育赛事活动,形成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节庆品牌。不断增强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连云港之夏、东海水晶节、赣榆徐福节等港城旅游节庆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四是建立促销奖励机制。按照连云港区域旅游中心辐射的范围和重点,主动出击,对重点海内外客源市场集中力量,加大促销力度。对直接招徕海外游客的国际旅行社按年度创汇额给予相应奖励。

5.创办媒体,特色期刊。国内唯一有正式版号的陆桥经济研究方面的杂志——《大陆桥视野》编辑部就位于连云港市,可以以此为载体,宣传“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共赢的巨大成就。其次建议成立“连云港期刊社”,创办具有连云港特色的城市综合性期刊,名称可以为《新丝路》(或者《东中西》《区域合作》《陆桥时代》《中国沿海》等)。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刊物,打造立足连云港、影响周边、辐射全国的综合性期刊。《新丝路》要以沿海城市、沿陇海线城市为阵地,在生态城市、创新型城市建设上做文章,在高度、深度、广度上下功夫,既有理论性又有前瞻性,更有指导性和操作性,在3—5年内,打造成为周边地区乃至全国有影响的时尚月刊。

(作者系连云港市委市政府督查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 于冰清



山东庄里藏名涧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一

伏广喜 阎祥富 杨庆昌



清《云台山志》山东村图

山东村,俗称山东庄,清时是东路镇(万金湖)南西数第五个村子。东、西、南、北分别与今日东磊、凌州村、云台农场张圩、小汪分场、南云台林场西大山分场毗邻。之所以称山东村,顾名思义,即地处前云台山主体花果山之东。土地 599 公顷,人口 3110 人(2009 年统计数字)。主产水稻、小麦、大豆、樱桃、杏、李、板栗、茶叶、油茶等,农、林土地经营面积均为 190 余公顷。

在山东村寻古寻什么?毫无疑问,是那条深藏于大山间的古老、深邃、曲折、幽长的大洞——孔雀沟。

孔雀沟为云台山中最长、最深的一条山洞。因其形状酷似孔雀而名。这是一条未经雕琢,由高山巨岸、深谷长涧、溪流湖泊、奇卉异木组成的原生态景观。

这条大洞,西北从唐王坝起,东至山东村北山口止。分数段,中间高,两端低。从竹节岭风门口至西北入口,为八才沟。发源于香炉顶,从东向西,至仙人桥与象鼻流小涧在桥南汇合,流入唐王坝水库,再汇集大村水库。此为西段,长 1.9 公里。东段由数条山洞汇集而成:由山东庄向上至孔雀湖那一段称龙潭洞;由孔雀湖向上那一段称老窰沟;由香炉顶向北汇入山东庄水库那一段称香椿沟;由朝阳岭发端向南汇入老窰沟那一段称棠梨沟。东段这些溪流最终都汇入山东庄水库,其溢洪入妇联河。孔雀沟全长 4 公里,山连岭叠,沟溪交错,百转千折,满目翠绿,构成了独特的自然风貌。

“竹涧迎凉”为孔雀沟风景中的一大看点。此由明人顾乾命名,为云台三十六景之一。他截取的是从九龙桥至孔雀



沟的竹景。这在他的《云台三十六景》中有所反映：“孔雀沟，多生从竹，翠翳参天，夏日纳凉，令人忘暑。”清《云台山志》也载，此处“从竹满山，蔚然幽邃。”顾乾还有一首诗对此景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披拂浓荫爽，风飘一洞凉。凉飕生翳水，清气绕修篁。绿霭盈眸丽，流泉到耳长。此间堪避暑，幽意乐徜徉。”从顾乾的诗文看，明代，竹子在这里已有相当的生长规模。而清代，这里不仅竹子长得茂盛，还建有一些与其配套的一些设施，如龙虎石、老虎桥等。对这青翠欲滴、绿浪摇曳的佳景，诗人张宾鹤在他的《竹涧》中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春雷拔地起青龙，赤目行天泻寒玉。”“稜稜劲节挺神姿，雪压霜欺两不知。”值得庆幸的是，今日孔雀沟，坡上坡下，依然翠绿满山，绿意盎然。“根粗如碗，稍插云天”的竹子成片生长，足有 10 多亩。这应当是上世纪 60 年代从浙江、安徽引进的毛竹，干径 4 到 12 厘米。此竹韧性强，既可制作各种工具及工艺品，又可在建筑上作梁、柱等用材。正在编印的《云台乡志》披露出一条信息：孔雀沟为我市最大的金镶玉竹生长基地，总面积达到 1.3 公顷。金镶玉竹，又称对青竹。宋代一位成都人在《东斋记事》中记录了它的存在：“竹子异品颇多……它竹黄而沟青，故每节若间出。人评为黄白如玉。”但是，千百年过去，这一珍稀竹品已难觅踪迹，惟有我市成片保留下来。该竹为嫩黄色，槽间为绿色的条块，如同镶进一块碧玉，美轮美奂。1993 年，邮电部发行了一套共 4 枚的邮票，其中第 2 枚即为金镶玉竹。

孔雀沟中的孔雀湖，为孔雀沟名胜区主景点之一，又名滴清汪，位于秃龙山侧，距山东村中心约 3000 米。从村前出发，登上这座约百米高的山顶，整个湖面尽收眼底。孔雀湖形成年代现无考，明代顾乾的《云台山志》对它记载曰：“在山东村北麓，约半余亩，其深无底，调旱如常。”该湖犹如一个巨型的聚口，不仅拦截了前面列举的孔雀沟诸涧的自然降水，玉女峰的西沟、松溪、石涧、东秃龙沟、华严峰、万沟、别峰等涧的山水也通过九龙桥，经孔雀沟汇聚这里。对此，清《云台山志》描绘曰：“九洞森流，半空飞瀑。”而清人黄申瑞则将其列入他的《云台二十四景》中的两景。其一为：《九洞争流》，“山间细流甚多，大者从洞汛注，其数有九。”其二为：《龙桥喷

雪》，“九洞之水汇流桥下，故名九龙桥……水激若雷，声震一山。”其情其景，由此可见。无怪乎此水长年一波如镜，清澈见底，原来有如此丰富的水源。

明代，在孔雀湖至龙潭洞，曾建一石桥，是顾乾《云台三十六景》中的一景，名《石桥流水》。

孔雀湖在云台山民间传说中，与明开山僧无相渊源很深。传说当年重建三元宫，当时还有一名普通僧人的无相，从江南化来大批楠木。传说滴清汪通南海，这些楠木均从滴清汪涌出。一天，无相正组织一帮工匠从滴清汪中一根根接这些楠木，并叮嘱工匠，够了就说“停”。当接至最后一根，工匠说“停”时，有一根楠木只冒出半截便停在湖中。然而，那天上梁时，当放置最后一根桁条即“中脊子”时，这根“中脊子”长度只够一大半。众工匠纷纷抱怨那个说“停”的工匠嘴太快。这些桁条均从江南化来，此时山高路远，该如何是好。这时，无相走来说：“别急，别急，我有办法。”说着，掀起这根半截桁条，拍了两下，两手一拽，不长不短，正好够用。所以，老人记忆中的三元宫正殿的“中脊子”就比其它桁条细一些。此传说与乾隆时讲十李普元在他的《东海志》中记述的《海浮梗楠》有很多相似之处。它虽不能代替正史，却佐证了当年无相化木江南由山下徐渡浦上岸这一事实。

1941 年，占领了云台山的日军看好了这片水源，在湖四周筑起了长坝，并铺筑了直通新浦的供水管道，为他们长期控制连云港的战略服务。连云港解放后，当地人对该坝进行了续筑，达到了今天高 20 米，宽 2 米的规模。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滴清汪一直为新浦地区自来水主要水源。随着游览西游圣境花果山的游客不断增多，孔雀沟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

孔雀沟除有大自然赋予的鬼斧神工的胜景外，那茂密的、多样化的植被也为它增添了无尽的魅力。人们都说，走进孔雀沟，如同走进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这里成片生长着 200 余种林木。其间，不乏美国松、湿地松、落羽松、鹅掌楸、乌鸡竹等国内外珍稀名木。那株有“糯米花王”之称的千年古树就生长在这里，树高 12 米，根围 2.34 米。当谷雨和立夏季节，树冠上缀满了清秀、洁白、芳香而又细长似流苏的银花，远看如大雪盖顶，近看如繁星散落。





糯米花王

糯米花,学名流苏树,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树木,在云台山区非常受欢迎。它既是观赏树,又可制作盆景,还可作为嫁接桂花的砧木,其叶还可制作茶叶。而这株如此

巨大,寿逾千秋的糯米花树的存在,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它还有更加神奇之处,即为全国独有的雌雄同体糯米花树,被国家列为百种濒危树种的前十位。中央电视台专程前往为其拍摄了专题片。多年来,守护这株古树的是荣忠山夫妇,均年逾九旬。据悉,他们已是这棵千年流苏树的第十二代守护人。丰富而茂密的植被,一半靠天成,一半为人为。美国金钱松,因叶呈圆形,酷似古钱,故被称金钱树,是世界4大观赏名木之一,属于亚热带植物。20世纪60年代,驻地单位省农垦南云台林场,经过半个多世纪不断的驯化,使其在这里成片生存。这里的美国湿地松,是1963年由南京、苏州知青植下的。如今,它们都高耸入云,见证了半个世纪前那批热血青年扎根山区的热情和艰辛。

为使这片藏在深山无人识的自然景观造福港城,地方政府正对其行规划和保护式的开发建设。已初步建成孔雀湖水挂珠帘、龙潭洞大峡谷、大峡谷石海、阴阳洞奇观、洪门寺遗址、铜盆庙遗址、龙凤同体“糯米花树王”、孔雀湖果品采摘园等景点。

地处云台山南的山东村,有两处遗迹对我市海陆变迁的历史研究颇有价值。

一是塔儿湾古渡。塔儿湾又称大塘湾,地处东

山坡一侧,因古代这里有一座古塔而名。此渡与南城的恬风渡(又名黑风渡、黑土湾渡)、石岸渡并称云台山三大古渡口。其中恬风渡、石岸渡渡出方向分别为海峡西岸的海州、海峡南岸的板浦。而塔儿湾渡出的方向为海峡南岸的今日灌云。该渡登陆点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兴建的杨公堤。从陈官《海州志》上看,该渡停用时间是清顺治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裁海令下,禁海口,此渡亦奉禁。”当然,南城的两渡口也在奉禁之列。所不同的是,17年后裁海令撤除,南城两渡恢复使用,而且一直用至乾隆初小海成陆前。而塔儿湾渡因杨公堤至板浦之间受海潮漫漫,行人不再登此堤。因此,此渡也就失去存在价值。但是,历史却记住了塔儿湾这个名字,因为它是有文字记载的云台山最早的与外部联通的水上通道。

二是云台山最早的成陆点。明末清初,东起大岛,西至海州城东一带,环绕着一湾海峡,名对口溜。从西岸海州至南城相距10多里。从南岸板浦至南城,相距50里。黄河夺淮后,洪水裹带大量泥沙使云台山东岸线不断抬升。山东、凌州这两个古村落前沿,是云台山最早结束海岛状态的区域,一条沙丘不经意间呈现出来,并一直向两岸延伸,直至连接。清人黄申瑾以敏锐的目光清晰地记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板浦至山50里,旧从黑风渡口,右至凤凰城,左至山东庄。数10年前,聚沙成堤,始有山道接山丘,无风波不测之患。”此处不仅为对口溜两岸提供了便捷的陆上通道,还给人们带来了另一个惊喜,即此处为登清风顶卜香之东路,对山南一线的香客来说,经此路,比迂回绕道大村要节省一两个时辰。从清《云台山图·清风顶》上可以看到,其图右下侧醒目地标有“由山东庄上山东路”的字样。其时,不知是官府,还是社会上贤达人士,在路边建一草庵,以供行人憩息。在黄申瑾的《云台二十四景》中,此为第二景,名《沙堤接引》。

山东村为今云台乡最大的行政村。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为乡建置或乡驻地。如1949年11月,为山东乡,辖山东庄、后山、大汪、小汪4村。1957年,在龙山乡与东磊乡合并时,此为东磊乡驻地。1966年,云台公社析置时,曾短暂驻山东村。

责任编辑 张伟敏



八朝古城所在地 ——城子村

孙 铭

在海州湾畔，黄海之滨的连云港市赣榆区，存在着数处古城遗址，李城子古城就是其中的一个。古城位于新沐河北岸，沙河镇政府驻地南的城子村。该村由四个自然村组成，自南向北为：南庄、张城子、李城子、徐城子。该地历史悠久，解放初在此曾出土石斧，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先民活动。村中有两座古墓葬，相传为前王坟与后王

坟，1957年4月在前王坟出土汉晋时期的马蹄金两块，在后王坟采集到铜质凤鸟形饰一件。同时，在李城子四周农田中出土有云纹图案与绳纹的瓦当、大布黄千、大泉五十、五铢等货币及三棱式铜镞等一些汉代遗物，田地中灰土较浓，汉代陶片瓦当随处可见，其田面积约1500平方米。1959年11月19日，南京博物院专家组对李城子遗址进行考古



苏马湾界域刻石

35



调查与探掘,认为李城子“既有汉代的墓葬,又是汉代遗址。”后该村又相继出土唐三彩用壶和明官德炉,再结合前王坟所出汉晋时代的马踏金来看,说明李城子遗址应为汉、晋、唐数代古城之所在。

既然说古城是汉、晋及唐诸朝古城,那么它应该是这些朝代的什么城?它的沿革如何?笔者就上述考古成果并结合史料谈一些看法。

1998年在连云港市连云区东连岛发现苏马湾界域刻石(见上页图),石刻云:“东海郡胸与琅玕郡柜为界,因诘山以南属胸,水以北属柜。西首况其……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苏马湾界域刻石新探》一文解释为“‘西首况其’首,到达。‘况其’即《汉书·地理志》中东海郡下辖三十八县中之‘祝其’。”据此可证明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前12年)立此碑时,胸具辖域及于今东连岛,东连岛以北属琅玕郡。东连岛以西直达祝其具境。由是度之,东连岛以西所对应的正是今赣榆区西南的沙河镇一带,从而证明今沙河镇之地属汉祝其具之范围,因而沙河镇驻地之南的李城子遗址毋庸置疑应是汉代祝其具境内的一处古城。那么,李城子遗址是汉代祝其具内的什么城呢?据《汉书·地理志》载,东海郡祝其具,“《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莽曰:犹亭。”羽山是东海县北部与山东省临沂市交界处的一座海拔269.5米的小山,传说此山曾为尧殛鲧(大禹之父)之处,所以,又名“焦父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羽山才被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禹贡》篇所记载。依记,羽山应在祝其具南,经考证两汉祝其具故城位于羽山之北的赣榆区班庄镇古城村,古城残垣尚存。而李城子遗址位于羽山之东,显然不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祝其具故城。据史料记载,汉代县级以下设置乡、里,里是汉代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和社会组织,多由垣墙或栅栏包围起来,有一个或两个门,伴有约百户人家,每户多为五口之家,其住地称为“宅”。由此推测,李城子遗址应为汉代祝其具境内的一座比较大的里城之所在。

西晋沿袭两汉仍设置祝其具,据《晋书·地理

志》载:东海郡,“祝其,羽山在具西。”(宋)乐史《寰宇记》怀仁县:“故祝其城,在具南四十二里平地。《太康志》云:在郟东九十里。”《大清一统志》载:“祝其故城在赣榆县南。”上文《太平寰宇记》所说的怀仁县与《一统志》所说的赣榆县,虽县名不同,实则同指一地。因今赣榆区宋代称怀仁县,金改为赣榆县,至明、清不变,故宋之怀仁县即清之赣榆县,其故城在今赣马镇城里村。

从上述史料记载,可获得祝其具故城位置三个地理坐标:该城西有羽山,西距郟城90里,北距赣榆故城42里。考定和依据这三个地理坐标,无疑便可确认西晋祝其具故城之所在。按城子村西有羽山,西至郟城直线距离约100里,东北距旧县城约60里,与《晋志》《寰宇记》及《一统志》所记载方位里数基本相符,当为晋代祝其具故城所在地。清末民初,由保合乡太和市(今沙河镇)绅商学界公刊,由清末生员、沙河镇城子村人张克勤(字铭斋)所著的《应世俚言》一书(现存于赣榆区档案局),作者署名为祝其张克勤铭斋氏编,看来也有历史可寻,并非空穴来风。由此可见,《晋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西晋的祝其具城位于羽山之东的城子村,是在汉代里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县城。而《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汉代的祝其具城位于羽山之北的古城村。正所谓山川之形难易,郡县之所可更,《汉书·地理志》与《晋书·地理志》同为正史《地理志》,皆巧妙地借助羽山这一自然实体作为地理坐标来定位祝其具城,为我们正确区分汉、晋两代的祝其具城所在地指明了方向。

西晋政权维持不久,便发生永嘉之乱,中原沦没,祝其之地先后为后赵南燕所有。随着淮河以北的老百姓相继渡江南下,东晋元帝初年(317年),晋割海虞(今常熟县)北境之地,侨立祝其、利城等县;穆帝永和六年(350年),又移置祝其于京口(今镇江),这时祝其具属侨立寄治,非本境之实土。

南北朝时期,祝其具仍侨立寄治于江南之地。北魏武帝太清年间,原西晋祝其具之旧地入于魏。东魏武定七年(549年),东魏在今赣榆区之南境的



沙河镇一带设置武陵郡(祝其城正在其地域内)。《魏书·地形志》云:“武陵郡领县二,上鲜,洛要,有武陵城。”据其上鲜下注云“萧衍齐郡,武定七年改置”,知上鲜原为萧梁所侨置的齐郡(齐郡原治临淄,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后地入于魏,改置上鲜,隶属武陵郡。因该郡领上鲜、洛要二县,上鲜为首县,当为郡治,即武陵郡与所领之上鲜县同治一城,所以武陵城也是上鲜城。《魏书·地形志》谓有武陵城,因改置武陵郡之故也。

《太平寰宇记》载:“武陵郡城在怀仁县南五十九里。”《读史方舆纪要》云:“武陵郡城在赣榆县南五十九里。萧梁时侨置齐郡于此。”据旧县城(赣马镇城里村)南59里有武陵城考之,在此范围之内实无其他古城遗址可考,只有李城子遗址符合此条件,当为武陵城之所在。所以,光绪《赣榆县志》云:“今大沙河南城子村,遗址尚存。”大沙河南城子村,即指今沙河镇南的城子村。其实,《太平寰宇记》所说怀仁县南42里的祝其城与《读史方舆纪要》所说赣榆县南59里的武陵城,因不同时代计里不统一,实则同指一地,即沙河镇城子村,说明武陵城实为西晋祝其城所改置而已。

人们不禁会问,西晋祝其城怎会成为武陵城呢?原因并不难回答。南北朝时,原西晋祝其县旧地为南北交争之地,萧梁占据祝其城时于其地侨置齐郡,其城便改作齐郡城,北朝东魏占领时,于其地置武陵郡,齐郡城又改作武陵城,北齐、北周因之。想见当时南北政权战火不断,相互争夺地盘,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无暇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造出一座像样的郡城或县城,西晋祝其城是利用汉代古城所扩建的老城,各方政权谁得之谁利用完全在情理之中。但应注意,此武陵郡、武陵城与当时南朝荆州的武陵郡、武陵城(今湖南省常德市一带)纯为异地同名。南北朝时,南朝常常在其地侨立所失已沦为北朝管理的郡县,北朝同样也往往模拟南朝地名设置郡县,显然此武陵郡为东魏模拟南朝武陵郡而名之,从而产生南北异地同名现象。有人说东晋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里所描写的东晋太元年间

“武陵人”就是指城子村人,可谓南辕北辙,荒谬至极。

581年,北周相国杨坚受周禅,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据《隋书·元胄传》载:开皇元年,元胄因帮助隋文帝“受禅”有功,进位上柱国,封武陵郡公,食邑三千户。依记,说明武陵郡至隋初尚存。开皇三年(583年),撤销武陵郡,并入怀仁县,隶属海州。但隋与西晋一样都是短命的王朝,皇权建立后只传两代便被唐所取代。文献记载,唐武德四年(621年),析怀仁县(本隋末东海郡旧县,隋末隶海州)置新乐县,治晋故祝其城(城子村),隶海州。六年,改为祝其县。八年,入怀仁。从此“祝其”这个地名便成为历史地名。但从城子村曾出土明官德炉来看,说明至明代祝其城仍是一个较大的居民点,其城仍被人们所利用。

通过以上的论证,可以肯定《晋书·地理志》所记的祝其城,即在今赣榆区沙河镇城子村,其前身为汉代的一座里城,西晋时期扩建为祝其城,南北朝先是萧梁侨置的齐郡城,继之又为东魏、北齐、北周、隋初时武陵郡城及唐代的祝其城,所以称城子村为八朝古城所在地也并不为过。

近期笔者来城子村考察时,发现城址已荡然无存。采访当地村民,得知此城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修水利时被平毁,出土的大量汉砖早已成为村民的院墙,农田中灰土被当作肥料而清理殆尽。然而,古城址虽已不复存在,但城子村却因此而得名,永远承载着这段厚重的历史。

(作者单位:赣榆区民政局)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谢元淮和他的《鹾言》

彭 云

谢元淮,生于清乾隆五十一年,逝于同治六年左右,离我们仅仅一二百年,今天许多人依然记得他。这不是因为他在海州做过什么显赫的大官,也不是在盐政改革上有过多大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主编过一部叫做《云台新志》的山志。那部书的体例清新,文采斐然,贴近群众,给后世修志者留下个很好的样板。他又是一位善于写诗的人,现在依然有不少游客,被谢元淮诗词的魅力所吸引,而走访云台山的。

谢元淮,文字记载说他“髫龄善诗”。髫龄,是指婴幼儿,那么一点点就能写诗,确实很难得。但奇怪的是长大以后,人们又往往拿他的诗和官阶相比较,认为能写这么好的诗,做这点小官未免大材小用。

嘉庆七年(1802年)19岁的他随父进京,捐了监生,作为做官的基础。后来在苏州谋得一个小官,干得很不得意,拖了几年,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辞官回归故乡,在家赋闲。嘉庆二十年(1815年)才二度出山,刚刚干了两年,又遭调父母双亡,只好回家守制。一直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才得到荆溪县(今宜兴市)典史的小官。典史是县令领导下的一个小杂官,虽然没有品阶,未入流,但仍属正规的朝廷命官,由吏部铨选、皇帝等批,具体负责抓捕强盗、看管犯人等一类的事情。

就在这前后,他认识了后来担任海州州官的唐仲冕等一些文士,大家都夸赞他诗写得,唐仲冕还对他的诗集写了序,序里夸奖:“一般人说话做文章,就没有他那五七言里讲的透彻。”道光元年(1821年)冬天,河道总督张文浩赴岭南,在邳州境内看到谢元淮的题壁诗,大加赞赏。后二年,江苏学

政周系英经常当众褒奖谢元淮的诗作,并且以“官不称才为惜”。

其实诗词对谢元淮的帮助并不太大,他的时来运转,还是在结识了江苏巡抚陶澍以后。

当年漕运受阻,陶澍谋划从海路运往北方,特派谢元淮到徐州去征募民船。谢元淮在徐州忙完了以后,又赶往上海,协助和查勘米粮与船只等琐碎事务,做得有条不紊。后来海运获得圆满成功,不仅将漕粮按时交付,还节省了运费百万两。因此陶澍对他的办事能力和勤勉工作很欣赏,事后保举他“不论繁简,满缺即升。”道光八年(1828年),他被委任苏州府照磨。照磨为正八品官员,任务是“弹劾百官非违,刷磨诸司文率”,类似我们今天纪委和审计局的一些工作。

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他专程来海州调查淮北盐政,同时兼任青口盐务委员。第二年四月,又作为随员和陶澍一起来到海州,从事纲盐改票的实际工作。以他和陶澍步步相随的行程,可以感觉到这时候的谢元淮,已经进入到改革的核心位置。最为有趣的是,他还和当地的两位地方官,共同出资购买了500引盐票,到安徽怀远、凤台等地试销,并组织一批商贩随行参观,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票盐的便捷和厚利。

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奉命主持赣榆县的政务,兼署海州分司运判,继续推行票盐新法,而且陶澍还放手让他大胆摸索,“随时讲求一切便利,不拘于成法。”《云台新志》也在这一年完成出版。

道光十七年(1837年),谢元淮任无锡县知县,接办淮北盐票总局局务。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设想将票盐新法在淮南推广。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重任淮南盐掣同知。到了咸丰元年(1851年),在两江总督陆建瀛的支持下,淮南票盐改革终于大功告成,盐价为数十年的最低,民众获利甚多,国家税收大增。他也得到换花翎、加知府衔、从四品的奖励。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事起,淮南票盐改革中断。咸丰三年(1853年),谢元淮70岁的时候,得授广西桂平梧郁盐法道,正四品,因为战争和年高路遥的影响,未能前往赴任。第二年,他入都觐见,因病乞休。

谢元淮办事是很有能力的,可惜年轻时没遇到像陶澍那样的知音。等到他后来能够大展宏图的时候,已接近暮年,且时局又十分危急,虽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毕竟已经是一匹只能告休的老马了。

谢元淮的《养默山房诗稿》,在他青壮年时期即已刻版印制。他在词令方面也造诣颇深。但谢元淮写诗有一个缺陷,就是长诗过多,短诗过少,特别能够让人朗朗上口的名句几乎没有。所以他作为诗人虽然有名,但诗的影响不大。他写的长诗《麟言》,全诗分二十个段落,每个段落短的十几韵,长的几十韵,浩浩荡荡,洋洋洒洒。从盐税对国计民生的价值咏起,很快便切入现实,切入眼下,讲盐政的腐朽与衰败,讲改革的紧迫和艰辛。在浩如烟海的清朝诗篇中,《清诗纪事》的编者,只选中了《麟言》和谢元淮与梁章钜一起勘察吴淞江水利的另一首长诗,只局限于谢元淮的事业,而对《养默山房诗稿》众多的诗篇却置若罔闻。这对于喜欢写长诗的谢元淮来说,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纲盐改票是道光年间盐政改革的一项成功之举,大大改变了清廷财政经济的实力,一时呈现了中兴景象。他以诗咏史,以诗咏事,虽然放弃了传统的形象思维手法,还是忠实实行“诗以言志”的规律。《麟言》完全有资格作为谢元淮的代表作存世。这首诗素人们不易见到,为了使读者对谢元淮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特意选择了其中的第十五段附在文后。它是写淮盐改革成功后的社会状况,这一段语言平实,不夸张,不浮泛。

“东风雨初收,湿烟散林杪。路逢两三人,语音

殊了了。自言皆灶丁,其一为野老。今春阴雨多,池盐未得扫。前日场商来,送钱催盐早。但有三日晴,交垣岂能少?往岁无人收,池坍茆屋倒,十家九逃亡,冻饿形枯槁。自从盐票兴,灶户人人饱。誓不再卖私,官收无烦扰。回头呼老翁,幸遇总督好。立法美且详,造福真不小。翁家住东村,相近高公岛。大儿操渔船,小儿贩蒲草。士秋洪水灾,一片黍豆漂。赖此票盐功,装载场河绕。蒲包价垂昂,卖蒲买香稻。斗米千余钱,积资十口保。票商若云屯,去来如飞鸟。银钱布无数,佣雇到跛眇。吾州百万民,藉活免流殍。其余语甚繁,感悦争颂祷。”

译文:东风雨刚停,薄雾还在树梢头游荡。路上遇到两三个同行的,虽然说的是地方土语,倒还清清楚楚。他们说,自己都是灶民,其中只有一个是在户。今年春上雨水过勤,没有扫盐的机会。前天场商来了,拿着钱催盐。其实但得连晴三天,我们一两盐也不会少给他。想起往年有盐没人来收,弄得盐池坍塌,住的茅草屋也倒了,十家有九家出去逃荒活命,个个饿得像小鼠似的。自从开始使用盐票,扫盐的人才把肚子吃饱,所以发誓不再卖私盐,还是和官家打交道省事。他们又和那个老翁说,幸亏有个好总督,立法既合理又详细,这都是我们老百姓的福分啊!老翁家就住在东村,离高公岛不远。大儿子弄渔船,小儿子贩卖蒲草。这一年秋天(“士秋”可能为“是秋”之误)又发了洪水。把所有的庄稼都淹了。依赖票盐改革带来的好处,盐的运销正常进行,装盐的蒲包涨了价,稻米相对便宜,一千多个小钱就能买到一斗,我们虽是十口之家,也照样混得下去。现在票商满天飞,往来频繁,拿着钱到处雇人,连残疾人都闲不住,所以我们海州的百万民众,都免遭冻饿的厄运。他们几个还说了许多话,都是争着讲票盐好处的。

(作者系市文联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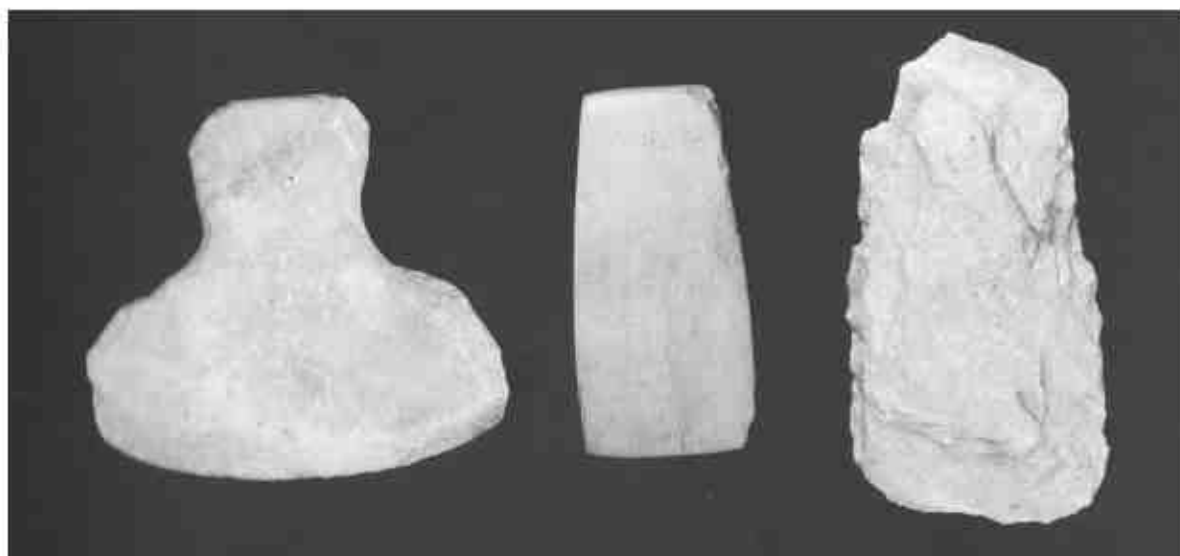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上)

刘凤桂

连云港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众多,已发现有30多处,大体可以分为四期。其上限为距今接近10000年,下限为距今3800年左右。发展有序,承续分明。第一期为二涧、大村(均为下层)、朝阳等遗址;第二期属山东大汶口文化类型,典型遗存有灌云大伊山石棺葬、东海青湖遗址等;第三期以连云港开发区藤花落古城址为代表,属典型龙山文化范畴,赣榆青墩庙、下庙墩、大台子等遗址也属这类遗存;第四期是继典型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地方

类型的遗存。

连云港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属后李—北辛文化类型,主要有二涧和大村下层墓葬、藤花落北辛文化遗址、朝阳遗址等文化遗存。早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和南京博物院考古部曾在我市的锦屏山南麓的二涧水库和云台山大村水库进行调查性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特征的石器、陶器等遗物。石器加工略显粗糙,有的在刃部和棱角部



二涧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





大伊山出土的红陶钵

位加以磨制,有的器身有明显的打制痕迹。陶器的陶系为占很大比例的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红陶。陶质中夹屑云母、贝壳等。几乎不见彩陶,以素面为主,朴实无华。纹饰以附加堆纹、划纹、指甲纹、乳丁纹为主,多施于器物的口沿至肩部,少量施于腹部。器形以鼎、钵、豆、釜、盆为大宗。由于当时北辛文化尚未发现,而江苏已在淮安发现青莲岗文化的典型遗址,故考古界相当一段时间将二涧、大村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归入青莲岗类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众多遗址,继而发现了北辛文化,并确认大汶口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的层位继承关系。考古专家们通过将二涧出土的器物与北辛文化器物进行对比,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极大的同质性,而与青莲岗文化的典型器物则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在苏北地区的邳县大墩子、刘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也存在,最终确认同连云港地区二涧、大村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属山东北辛文化范畴。这就在考古学年代的确认上就向上推了一步,大体上为距今 7400 年至 6400 年左右。

1989 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淄后李官庄发现的“后李类型”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考古学年代为距今 8200—7600 年。目前,我市的朝阳遗址(1995 年发掘)、藤花落北辛文化遗址下层均发现有后李文化遗存和层位关系,从而找到了我市北辛文化类型的发展源头。著名考古专家张学海先生指

出:后李类型“留在鲁东南地区的则是吸收了裴李岗文化因素,发展成为北辛文化”。由此,我市新石器时代的年代又可向前推到距今 8200 多年。这与我国旧石器时代距今 10000 年的下限年代已十分接近。2004—2006 年,南京博物院和连云港市博物馆联合对将军崖旧石器遗址的桃花涧旧石器地点第二次发掘,发现有人类生活遗迹和原始陶片。有专家推论它是继细石器时代之后发展起来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果这个推论在今后被新的考古资料所进一步证实的话,那么,连云港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上限年代就可达到距今 10000 年,这也符合目前考古界对我国新石器时代上限年代的基本判断,从而表明连云港地区史前原始文化的发展,自距今 20000 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开始,到后李—北辛文化,中间没有断层和缺环,是承续发展的。

继北辛文化之后,连云港地区的历史进入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由于海平面在这个时期早中期上升,造成古文化遗址大量减少,目前只在锦屏山的二涧、东海县的青湖两处遗址中出土有大汶口中期的文化遗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伊山石棺葬,其年代为距今 6500 年,晚于北辛文化,略早于大汶口文化,因其有不同于大汶口文化的某些内涵,有的专家将其归入青莲岗文化范畴。但从出土的器物看,与二涧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如陶质以夹砂红褐



陶、泥质红陶为主,常见器物有斧、鼎、钵、盆;石器以磨制为主,少数有打制痕迹等。因此我们还是将其归入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类型,或可称之为北辛与大汶口之间的过渡类型。这一类型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从墓葬中死者面部覆盖红陶钵(并有刻画陶文)这一远古风俗看,与二洄乃至江南的马家浜文化的草鞋山类型有共同性,可知它确与江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大伊山石棺葬全部为女性墓葬,说明其时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此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为仅有的一例,以天然石板作棺槨和棺盖,与世界范围的环太平洋文化带上的石棚文化和大石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根据大伊山石棺葬为距今 6500 年的数据,我市的大汶口文化期当在距今 6500—3500 年,则大汶口文化在连云港地区跨越时间 2000 年左右。尽管目前发掘的遗址并不多,但根据邻近连云港地区的鲁东南一带大汶口遗址的分布情况和发展走向

分析,估计今后在连云港西北部地区将会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或墓葬被陆续发现。

继大汶口文化之后,龙山文化开拓了连云港地区史前文化的辉煌时代。连云港地区的龙山文化以其遗址之多、内涵之丰富,在中国考古学中所占位置之重要而令世人所瞩目。目前,在市区的海州锦屏山、云台山,以及东海、赣榆、灌云和邻近的沐阳等地均有发现。

大汶口中后期,山东半岛和苏北地区环境变化开始有利于原始农耕的发展。温暖湿润的气候、海岸线的相对平静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发育。原来的适合干旱偏寒气候的旱季粟类作物,渐渐退居次要位置,代之而起的是水稻的种植。原始农耕的发展同时带来家庭饲养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以及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从而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由于男子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提高,母系社会开始向父系社会过渡,从而为父系社会的龙山文化铺平了基础。到了典型龙山文化时期,连云港地区迎来了史前文化的辉煌期,无论在遗址的数量和规模上,还是在出土器物种类丰富和造型工艺的精美上,抑或在各类遗存所展示的文明程度上都较之大汶口文化时期有很大的进步。

连云港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器以灰陶和黑陶为主,代表性的器型有蛋壳黑陶镂孔高柄杯、大圈足灰陶豆、平底三足盂、深腹圆底釜形鼎、圆底或平底钵、盘式扁平三角形足红陶鼎、三角“鬼脸足”式鼎。而作为祭祀礼器的白陶大袋足鬶的出现,则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石器方面以扁平穿孔石斧、通体磨光的弧背小石锛为主要产品;玉骨器方面,藤花落、大伊山、青湖等出土有玉玦、玉瑱、玉片等。骨器有骨锥、鱼钩等。人类的居住条件已大为改观。人们走出窟居洞穴,住进半地窖式、平地而起式乃至高台式建筑,出现了众多氏族聚落,最重要的是出现了聚落中心——早期中心城市。

精神文化方面:这个时期的原始宗教,盛行天体和太阳神崇拜、犀象崇拜、农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信仰为鸟图腾,与整个东夷文化区原始宗教崇



藤花落出土的白陶鬶



连云港市解放初期的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张学贤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背景

1948年11月7日,新海连地区解放,11月9日成立新海连军事管制委员会。月底,根据鲁中南行署转达山东省人民政府命令:划原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云台山地区为新海连特区,建立特别行政专

员公署。李云鹤任专员,下辖新海市政府、连云港市政府、云台办事处。

1948年12月12日,中共新海连特委成立,谷牧任书记。特委隶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鲁中南区委,下辖新海市委、连云港市委、云台工委。

由于战争破坏,加上灾情不断,1950年,特区

拜是一致的。将军崖是一处“以石为社”的社,主要用于对土地神的崇拜和对祖先的祭祀。藤花落龙山文化古城址发现了氏族大型祭坛,并有人殉和牺牲,推断应有巫一类的、属知识阶层的专职宗教人员;原始文字符号进一步规范,表现为从原始陶文向石刻岩画的过渡,将军崖岩画的岩刻符号,初步统计有30多种,内涵丰富,有表示燎祭、天体崇拜、鸟图腾崇拜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刻画符号乃氏族的文化共识,具有稳固性和延续性,其中某些符号可以与殷商甲骨文相比附,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原始艺术进一步拓展,将军崖岩画第一组内容,反映出岩画创作和原始巫术傩舞两大原始艺术门类。属于祖先崇拜的对部落首领(战神)形象的刻画继之发展而成为面具崇拜,而在氏族的盛大祭祀典礼中,面具又作为娱神、媚神的巫术歌舞

活动——傩舞的道具,从而产生了原始的歌舞艺术;原始天体观念和天文学:从大汶口时期死者头部覆盖红陶钵的葬俗,到龙山时期将军崖岩画所处山体覆钵形天体造型看,显示出“盖天说”或“天圆地方说”的天体宇宙观。将军崖第二组画面的三个太阳组合、星云带、子午线、月亮、星座等刻画,是原始农耕文明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是原始天文观测以山体石质为载体的真实记录,与《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寅饯纳日”的记载或有一定的关系。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胸海书院)

责任编辑 张伟敏



把“生产自救”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如何动员组织各界人士,参加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巩固新政权,在没有正式建立政治协商机构之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应运而生了。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

1949年9月16日至18日,新海连特区召开首届各界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各界代表共188人。中共新海连特委代表苏羽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张云榭代表专署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经民主选举,中共新海市委书记刁一民当选为首届各界代表会议主席,工业界代表张荣山、商业界代表张晋阶分别当选为副主席。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提案175条。会后成立了生产建设委员会,张云榭任主任委员。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十年中,主要做了十项工作:1、帮助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改革;2、审议和推行政府各项政策法规;3、协商民主建政,建立地方政权;4、动员全市人民发展生产,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5、组织与推动知识界、工商界、宗教界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土改、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6、开展时政学习,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促进各族人民团结进步;7、联系各界群众,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

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解放初期,我市行政区划变动较频繁,1949年11月1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新海连特区行政专员公署改为新海连市人民政府。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新海连市与东海县合并,成立新海县,党政机关隶属中共临沂地委、临沂地区专署领导;同年12月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又决定撤销新海县,恢复新海连市与东海县。

随着地区调整和工作需要,政治协商组织名称也有小的变动,开始叫“各界代表会议”,中间改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下设常务委员会,后来常务委员会又改称协商委员会。

据有关资料介绍,从1949年到1956年,全市共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5届、13次会议,召开常委会、协商委员会45次。

二是根据国家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民政协组织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所以新海连市各界代表会议也同样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许多职权。比如:

在1949~1950年,召开的首届各界代表会议期间,曾经讨论通过成立《生产建设委员会》《新海连特区工商业联合会》《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等重要决定。

在1951~1955年召开的新海连市第二届到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先后讨论通过《关于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联合签名的决议》《发动全市人民开展抗美援朝和拥护市郊土地改革的决议》,讨论镇压反革命事项,作出《成立人民法院的决议》,和新海连市政府政务会联合讨论通过《关于镇压土匪和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决议》《关于巩固三反五反运动胜利成果,大力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贯彻国务院粮食定量供应办法的决议》等等。

1956年2月17日,根据国家规定,新海连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成立政协新海连市第一届委员会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意见》报告。当年2月23日至27日,政协新海连市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到此我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才完成历史使命。

工商界代表张晋阶

据了解当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组成人员,除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有关人员,还邀请一些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思想品德较好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这些党外人士排除各种干扰,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为巩固新政权作出重要贡献,工商界人士张晋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优秀的代表。

张晋阶,1907年出生,本市连云区人。1925年起,先后在板浦、海州和新浦的商店当营业员。



1932年,任同胜义商号经理。1937年创办“同和公”布号。1941年至1951年集资经营“义兴公”布号,任经理。1949年担任新海连特区工商联筹委会主任。1952年至1955年从事粮食、煤炭代销业务。1956年至1959年在市煤建公司任业务员、股长,后安排到市日杂公司任营业员直至退休。

张晋阶先生是我市统一战线元老级代表人物。早在1949年,就当选新海连特区首届和新海县各界代表会议副主席。市政协成立后,又先后当选一、二、三、五、六届政协委员,民建会员。

我与张晋阶老人相识于1950年冬。当时,山东省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省政府分配新海连市四个代表名额,市委决定由市总工会主任马子厚、工商界人士张晋阶、私营企业代表赵理斋(代表锦屏磷矿)和学生代表张学贤出席会议(我正在海州师范读书)。当时从新浦到济南,要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几位长者不时交谈,消磨时间,我在旁边静听,很少插言。

张晋阶先生很健谈,除介绍他从商经历,遭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勒索之外,还详细介绍他在1948年11月迎接解放那几天的故事。

他介绍说:“11月6日吃过早饭,我到东海县商会去看看,当时我是商会常委,还分管财务。我爬上商会的办公楼,只见到会计张玉峰一个人,我问还有人呢?他说都跑了,你看楼下院内烧一堆纸灰还在冒烟(楼下是国民党东海县党部)。

“这时,我眼巴巴地盼望着解放军早日进城。我吃尽了国民党苛捐杂税的苦头,我的妻弟和侄儿都早已参加解放军,他们偷偷传递信息告诉我,共产党、解放军爱护人民,保护工商,买卖公平,很受老百姓的欢迎。”

“7日黎明,我到大庙巷看看情况,听说有人在锦屏磷矿那边看到解放军,我就自告奋勇地去欢迎,途中又串联王友芝、管启斋一同去西院。路上老百姓听说我们去迎接解放军,不由分说都跟着我们走,回头看看估计有六七百人之多,不一会我们终于迎了解放军。

“当天中午,我到‘义兴公’布店挂起一面红旗,随后民主街两边商号都挂起了红旗,呈现出一片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

“新浦解放以后,大家都想为解放军出点力,听解放军一个团长说,塘沟那边还有国民党残余部队,需要借两辆汽车拉大炮,我就帮他们借了两辆货车,很快把大炮拉到塘沟。后来听说,解放军向山上放了两炮,国民党残兵败将就挂起白旗投降了。

“过了两天,徐敬甫告诉我,新海办事处主任周子虹要我想办法解决三四天的给养问题。我随即向‘吉太永’借50包小麦,并组织加工成面粉,做一部分馒头,送到新海办事处,解决了一时供应之急。

“又过了两三天,由周砚伯、徐敬甫组成商会临时办事处,我也参加了。我两次拿出60万元北海币,同仁花西亭、丁圣五也各拿出30万元,交给办事处雇佣几个人为解放军办事。同时动员各家商号开始营业……”

张晋阶先生的介绍,让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想起1948年解放那一天,海州师范许多师生怀着恐惧心理,随着国民党溃逃徐州,而我们这些未走的青年,对新政权也是疑虑重重,谁敢走上街头公开迎接解放军进城呢?由此告诫自己,要踊跃参加省各界代表会议,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跟上时代步伐。

时隔65年,张晋阶老先生迎接解放的故事,以及后来积极参加统一战线各项工作,为建设港城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

(作者单位:市委统战部)

责任编辑 张伟敏



磨山史话

王宗富

巍巍磨山位于东海县城之北 25 公里，苏鲁两省交界处，北依烟波浩渺的海陵湖，东邻石梁河镇，南面是青湖镇，西靠东海经济开发区南辰北区，西南方向则属于山东省临沭县。

山体为东西走向，海拔 158.3 米，面积 0.6 平方公里，山体为沉积花岗岩结构。清代该山属于赣榆县，因从县城向南排数，该山处于末位，故名“末山”。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末山在西南 70 里，西北之山至此而尽，故名。”后因石匠常在此山采石加工石磨，遂改称磨山。

一、一处名山

磨山为苏鲁交界处的一座名山。磨山东麓后大夼村清末老秀才田泽春心系故里，志在磨山，寄情山水，在《末山古寺序》一文中洋洋洒洒，淋漓酣畅地记述了磨山之胜迹。

山上有唐代古寺，有山门、巨灵殿、三官殿、晋神殿、三教堂，殿堂间石级、甬道相连。环寺地形险要，“前山龙虎相拥，后山俨然列屏，上有泉乐，下有醴泉，风籁则气聚，此真而寓者可作仙佛之居。”为世人所仰慕，山间古木参天，名树处处，名石众多，名泉遍布。

序文还重点描述了末山庙会之盛况：“每岁六月六日，为香火会，环山村民先数日内，醮预购祀品。届时，肩旗曳鼓，摩集山麓。卓午，列队而登，一时人声沸腾，角声呜呜，鼓声隆隆，撼山震谷，火炮横飞，响彻云衢。翘首一望，半山伞盖幢幢，彩帜缤纷，与葱茏树木相掩映。寺门香火缭绕，神前蜡火熊

熊，如起暮霭而喷朝雾。”当时，西至临沂，东达海州，南到白塔埠，北极大店、十字路，来此游览者，盥香火会者，做买卖者，赏庙会者，烧香祈福求安者，望保佑者，往来而不绝也。后寺庙毁于民国年间乱世灾祸，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沿石级以凌绝顶，远眺沂邳，则极世界之大观，一览而余矣。1946 年秋天，陈毅司令员登临此山时，曾颇有感慨地说：“苏鲁边界，突兀此山，修林茂竹，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纪念位于此处，尽显先烈如日如月凛然之气也。”

二、一座名塔

名山矗名塔。

磨山抗日烈士纪念塔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建成的，也是东海县（抗战时东海县陇海铁路以北的地域属海陵县）境内唯一的一座抗日烈士纪念塔。

抗战时期，磨山南北，海陵大地，战事不断。

东北军 57 军独立旅（统战面貌，实为共产党领导），挺进海陵地区的八路军 115 师老四团及海陵县大队，海陵各区的地方抗日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机动灵活，奋勇杀敌，以弱胜强，与日匪伪激战数百次，攻克一系列据点，取得了抗战中的重大胜利，使海陵县成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在这弥天的烽火中，为了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有一大批人前仆后继，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41 年 9 月 27 日，驻东海县桃林的日伪军对根据地边缘村团林进行抢掠，57 军独立旅在团林



预先设伏,包围并歼灭日军 1 个小队。这次战斗缴获机枪 1 挺,步枪几十支,受到中共山东分局的嘉奖。而在战斗中 1 营营长杨庆福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部队士气高昂,杀声震天,从东面将敌人压缩到一个小水塘附近。敌人龟缩在水塘边的屋内进行顽抗。而此时敌人的援军已经迫近,在这关键时刻,为尽快解决战斗,杨庆福率部向水塘边冲击,不幸牺牲。倒下时,还大声说:“不要管我,一口气攻进去,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一批指战员也相继血洒水塘边。

海陵县大队大队长樊彦英,也在一次率队与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1941 年,八路军 115 师配合海陵县大队围剿马陵山一带的顽匪,解救被绑架的群众,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牺牲了一批干部和战士。

……

为了纪念这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海陵大地上的 177 名烈士,激励海陵军民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海陵县政府决定集资在磨山之巔建造抗日烈士纪念馆。由县参议会副议长杨凤鸣等人负责筹建,1944 年 9 月破土动工,1945 年 4 月落成。



磨山抗日烈士纪念馆

塔面南偏东 27 度,由花岗岩片石砌成,分为踏步、塔身、塔顶三部分,通高 5.4 米。塔身四面嵌四块石灰岩质方形石板拼成的组合式碑面,高 3.5 米,宽 0.65 米。正面阴刻“抗日烈士纪念馆”七个大字,字径 50 厘米;背面镌刻“抗日烈士纪念馆序”,字径 4 厘米,正文 7 行,每行 52 字,标题 1 行,落款接在正文的最后一行上,全文 352 字;两侧刻着烈士英名,东侧是 177 名抗日烈士,西面是后补上的解放战争时期的 36 位烈士。序文和落款均为楷书。由当时海陵县县长铁秋作序,颂赞烈士丰功伟绩。

1947 年,国民党 74 师北犯沂蒙山区,路经山下,竟用枪对塔疯狂射击,致使塔身受损。

1985 年秋天,当年的海陵县县长,时任鞍山市副市长的铁秋,时隔 40 年,重返东海大地,登临磨山极顶,面对无限秋光下的纪念馆,重读自己写的序文,感慨万千,手抚塔面,禁不住泪水长流,并从塔四个方向分别向纪念馆三鞠躬。他深沉地说道:“想一想,东海大地是块热土呀,40 年了,当年多少热血儿郎在这儿流血牺牲,与入侵的日本强盗战斗,我当时就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我们活着的人,时时都不能忘了他们,应珍惜眼前,只争朝夕,为社会和人民多做奉献。”离开时,还口占一绝(据管理山林的一位老人谈,老县长当场吟了好几首诗,他只记下了其中的一首):“海陵大地磨战血,当年烽火照天际,几度浴血打豺狼,赢得天下和谐日。”

磨山“抗日烈士纪念馆”七个气魄雄浑,用笔遒劲,高旷凝重的大字及塔序、塔侧的烈士英名是谁题写的呢?自建塔以来,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历史的一页仿佛已被岁月所淹没。这次笔者专门为此事走访了磨山周围的几十个村子,走访了曾经在磨山大地战斗过的十几位老干部,刨根问底,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了解、调查出与矗立的塔身相映生辉、与气势磅礴的磨山浑然一体的塔文题写是出自磨山西侧的鲁开讲老先生之手。

鲁开讲当时是海陵县鲁观堂村(现属临沭县大兴镇鲁观堂村)人,清末秀才,1941 年至 1945 年在海陵县大港头村抗日小学教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区政府的多次表彰。当时鲁开讲先生的



毛笔字,尤其是楷书和隶书,在磨山一带颇为出名。海陵县政府在羽山西头村、涝枝村,八路军 115 师在西朱茆村、蛟龙湾村几次召开的庆功祝捷大会的会标都是他书写的。这次铁秋慕其名,登门拜访,鲁开讲甚为高兴,满口答应。认为能通讨自己的笔记烈十之功,扬烈十之风,是殊荣之事。遂于夜间沐浴更衣,焚香净手,在教室内凝神聚力,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完成了县长铁秋交给自己的这件光荣任务。从而使纪念塔更加厚重,更加具有时代风采。

历经 40 多年的风雨冲刷,加之 1947 年国民党军队的肆意破坏,碑身已破损严重。上个世纪 80 年代,东海县人民政府又拨款依照原有款式重新整修了一次,用大理石修砌碑身,四周广植林木,使纪念塔面貌一新。同时又在磨山东侧,新建陈列室 10 间,从而使纪念塔的内涵更为丰富。

1993 年 3 月 16 日,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磨山抗日烈士纪念碑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4 年,东海县人民政府又投资 20 万元,遵循“修旧如旧”的理念,再次对纪念塔进行了维修和保护加固工程,使纪念塔更加雄伟,成为苏北鲁南地区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一座名塔。

三、一方名碑

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怀念和敬仰,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东海县人民政府于 2010 年 2 月正式启动“慰烈工程”,在“抗日烈士纪念碑”的南侧,即磨山南麓,新辟陵园,对东海县境内散葬于各乡镇的 148 座烈士墓进行了集中安葬,给烈士一个安静、纯洁、神圣的归宿环境,并于 2011 年清明节前夕完成。

烈士墓区占地 1 万多平方米,新建天青石碑楼和一座 12.7 米高的磨山烈士纪念碑,碑身正面是一块反映东海革命斗争中恢宏场面的汉白玉浮雕,背面镌刻碑文。新铺公祭广场 5000 多平方米,方便人们缅怀烈士。栽植绿化、美化苗木 1000 多平方米,使陵园四季葱茏,绿意盎然,繁茂茁壮,象征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集中安葬的烈士中,有各个历史阶段的。

其中有一批献身于抗日战争的,如 1942 海陵县陈岭(现属东海县石梁河镇)等村的 30 多名青年学生,受组织派遣,奔赴延安抗大学习,途中在磨山



磨山烈士陵园纪念碑

西南角的东港头村一带(当时属海陵县),遭遇“扫荡”的日伪军,虽奋力反抗,英勇突围,但伤亡惨重……

其中有一批血洒解放战争时期的,如东海县南辰北区南辰村的张继坤,1941 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某部连长,1947 年 5 月牺牲于四平街战役。

其中有一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了生命,如东海县温泉镇甘汪村的李士宏,时任志愿军二十军九十师二六九团排长,1950 年牺牲于朝鲜。

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血沃大地,如东海县石梁河镇的卜庆飞,1993 年考取中国飞行学院,三级飞行员,空军上尉军衔,2003 年 9 月在广西南宁机场飞行训练中牺牲。

……

磨山顶峰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与磨山阳坡上的烈士集中安葬墓群已形成一个壮观的红色记忆整体。在绿树花木的掩映中,在大山的怀抱里,浑然整合为一个环境幽雅,四季常绿,溪水长流,百鸟相鸣,充满生机的磨山烈士陵园。

(作者单位:东海县南辰关工委)

责任编辑 张伟敏

